

與世相接—— 嚴智怡與天津博物院的誕生

余慧君*

本文的研究主題，是以嚴智怡(1882-1935)為首的天津博物院團隊，其規劃、策展、研究等專業能力與文化視野的養成過程。在「實業救國」並「文化救國」的脈絡下，如何逐一建構出包括直隸省商品陳列所、天津博物院、天津市立美術館等在天津北洋新區內的博物館群，並在典藏、展示之外，為城市大眾設計教育推廣活動。本論文將從巴拿馬賽會對嚴智怡的影響為起點，探究世界博覽會與中國博物館興起之間的關係、文物捐贈者與博物館的互動、天津博物院的展示特點等。嚴智怡在參與巴拿馬賽會過程中，實地與日方參展團隊較勁之後體認到的各項挫折，在他回到天津之後，藉由創造常設性的展示場域，尋求解決之道。他擔任直隸商品陳列所所長，推動直隸實業發展；建立天津博物院，以解決中國文明雖有大量累積卻缺乏科學整理的問題；並促成天津市立美術館的成立，以面對中國美術落後日本甚多的困境。本文將特別針對天津博物院的建制歷程，探討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第一代博物館專業管理者，如何藉由博物館展示、進行具現代性的、有效率的、可持續衍生的社會關係生產與文化知識生產。

關鍵詞：嚴智怡、巴拿馬賽會、天津博物院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博物館」在歐洲的出現，除了典藏並傳播知識之外，同時也被官方視為製造並維持帝國性、現代性、主體性的詮釋機構。而當「博物館」的概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輸入亞洲之後，快速的先被日本然後中國複製並蔓延開來，也是基於其作為測度帝國性、現代性、主體性之政治功能。

最早在中國出現的博物館，據說是 1872 年法國耶穌會士在上海創辦的徐家匯博物館 (Musée de Zi-ka-wei)。差不多同時期，英國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支會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於 1874 年在上海成立一個半公開陳列館。¹這些由歐洲科學研究組織贊助而位於中國境內的博物館，可視為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各國探索境外知識的延續，收集海外標本，並成為歐洲博物學的境外實驗室。

實業家張謇 (1853-1926) 於 1903 年對日本大阪博覽會進行考察，並參訪了大阪、東京、札幌等十五個重要城市內的實業教育相關機構及博物館，印象極為深刻。²返回家鄉江蘇南通之後，他應用在日本參訪所得的城市規劃知識，大力投入南通各項城市公共建設。³並動用個人財力，集結南通地方鄉紳的贊助支持，於 1905 年，成立了「南通博物苑」，被視為第一個由中國人發起並組織運作的博物館。⁴同年，張謇也上書大清學部以及張之洞 (1837-1909)，建議應該要在每一省

¹ 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頁 334-335。

² 關於此次東遊的所有細節，見張謇，《癸卯東遊日記》。

³ 于海漪，《重訪張謇走過的日本城市》，頁 7-9。關於南通作為二十世紀初的模範城市規劃，見 Qin Shao, "Space, Time, and Politic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antong," 99-129.

⁴ Lisa Claypool, "Zhang Jian and China's First Museum," 568.

設置省立博物館，並仿照日本模式，在北京設置一座向大眾公開的「帝國博覽館」。⁵張謇認為此「帝國博覽館」應該要有三個部門：天然部、歷史部、美術部。所有在「帝國博覽館」展示之作品，或由清皇室提供，或由私人藏家提供，或由地方官員征集而得。張謇希望此博覽館計劃，可以像乾隆時期的四庫全書計劃一樣，集普查、收藏、整理、展示於一體。然而，張謇的願景在帝制時期從未被實現，清朝皇帝與大部份朝臣還來不及意識到公共博物館可以是展演帝國榮光極佳之策略，甚或挽救帝國於不潰的良藥一帖，清朝便已覆亡。

除了張謇大聲疾呼建制官方博物館之外，宣統皇帝溥儀(1906-1967, 1908-1912 在位)重用的滿人翰林金梁(1878-1962)，亦主張藉由建立皇室博物館以挽救帝國榮光。1910 年，溥儀尚未遜位之前，擔任奉天旗務處總辦的金梁便因盛京是大清帝國成立之初最早的都城，大力建議小皇帝將盛京皇宮改建成一個向大眾開放的「皇宮博物院」。金梁甚至已將盛京展覽廳與展件內容初步規劃完成，然而，此計劃並未得到溥儀的支持。⁶以至於到了 1914 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內務部得以將金梁當初規劃好的盛京故宮皇室藏品整套移至北京，成立民國的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即「古物陳列所」。⁷自此之後，中國正式進入博物館時代，逐漸完成各省級博物館的建制工程。

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出現的眾多博物館，從建制目的、資金贊助、藏品來源、行政管理團隊的脈絡來看，可大致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圍繞著遜清皇室收藏品的眾展示機構，包括滿清遺老主持的「盛京故宮」(即現在的瀋陽故宮博物院)、北洋政府支持的「古物陳列所」、

⁵ 張謇，《張謇全集》，第 4 冊，〈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頁 272-276。

⁶ 金梁，《光宣小記》，〈皇宮博物院〉，頁 132。

⁷ 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頁 23-25。

以及南方國民政府主導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當時主要的政治集團，都在覬覦溥儀退位離開紫禁城之後所留下來的的大批清皇室收藏。從爭奪藏品到各博物館管理階層的人事改組，引發了一次次的政治風暴，展演出共和中國與帝制中國之間的斷裂與連結。⁸

第二類，是以「國立中央博物院」為代表。南北統一之後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在 1933 年始籌備「國立中央博物院」，集結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界菁英，建立中華民國的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類同於美國的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典守並展演國族文化認同與國家主導下的現代科學發展。⁹然而國立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遷台之後，卻由教育部於 1965 年「委託」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至今。¹⁰這樣的委託決策，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故宮」作為過往帝國政權象徵的重要性，凌駕於以現代國家認同與科學研究為主軸的國家博物館之上。

第三類，是以南通博物苑，和本文的焦點——天津博物院——為代表，屬於地方自治概念下，士紳菁英自主發起並籌資興建的城市型博物館。其主事者在公部門或有擔任職務，但是博物館一開始營運的主要經費來自於私人募款贊助，其後才得到公部門經費挹注。此類城市型博物館，標誌著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現代城市的文化生產，由地方紳商、文人、教育文化官僚等為行動主體，以個人名義贊助而形成的

⁸ 中華民國從接手大清皇室秘藏，進而轉變為典守國家文化遺產的歷程，史學界與博物館學界關注甚多，議題包括物品所展現的大清帝國記憶，共和體制下的文化遺產保存，以及故宮建物本身從皇權到民族國家象徵的轉型等等。見林伯欣，〈「國寶」之旅——災難記憶、帝國想像，與故宮博物院〉，頁 227-264；Tamara Hamlsh, "Gobal Culture, Modern Heritage: Re-membering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137-160.

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籌備經過報告〉，頁 27-33。

¹⁰ 譚旦同，〈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

新興文化場域，並成為城市居民日常遊憩的公共空間。

第一、二類博物館，是因政權而存在的國族認同與國族記憶實驗室，為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建構了國家政權需要的神話。¹¹第三類博物館，是為後科舉時代新興仕紳階級為形塑大眾知識、展演城市歷史記憶、規範並落實個人生活脈絡裡的科學性與現代性而存在，展示內容偏向百科全書式的大眾人文歷史與自然科學知識，以通俗語言配上大量圖示的「畫報式」展示為手段，可視為 Tony Bennett 所說的「城市管理實驗室」(civic laboratory)，以生產城市文化生活與市民意識。¹²

在天津博物院成立之前，中國各地的博物館屈指可數，不過，推動具現代概念的公共博物館，已然成為「新文化運動」旗幟下重要的文化策略之一。¹³城市博物館的逐一出現，養成了中國第一代專業博物館管理及策展人才，並成為培育未來博物館專業所需人才的溫床。策展專業(curatorship)不只鋪陳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同時是連結人與人、人與文化的具體社會實踐。¹⁴本文的研究主題，是天津博物院的創辦者兼第一任院長嚴智怡(1882-1935)，其規劃、策展、研究等專業能力與文化視野的養成過程，以及天津博物院的建制歷程，探討二十世紀中國第一代的博物館專業管理者，如何在「實業救國」並「文化救國」的風潮之下，藉由博物館展示，進行具現代性的、有效率的、可持續衍生的社會關係生產與文化知識生產。嚴智怡可代表清末新政至民國、後科舉時代新式教育下新一代的專業文化官僚。其主導的策展工

¹¹ 關於博物館與國族認同的建構，見 Donald Preziosi, "Narrativity and the Museological Myths of Nationality," 37-50.

¹² Tony Bennett, "Civic Laboratories: Museums, Cultural Objecthoo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 521-547.

¹³ 陳為，〈新文化運動與博物館的關係——兼述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初步發展〉，頁 47-58。

¹⁴ Christina Kreps, "Curatorship as Social Practice," 311-323

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為主持直隸省商品陳列所，二為策劃並執行直隸代表團在美國舊金山巴拿馬賽會的所有展出活動，三為創辦天津博物院並擔任院長一職。嚴智怡是民國初期一個極為成功的文化能動者，以博覽會與博物館聚攏津沽地區豐富的文化資源。在他近三十年的官職生涯裡，最主要的貢獻便是結合一批理念相近的文化官僚，包括陸文郁(1887-1974)、樂嘉藻(1867-1944)、李裕增、嚴智開(1894-1942)等人，推動商品博覽會、商品陳列所、博物館、美術館規劃與策展，一步步建構出天津北洋新區內的城市博物館群。本文將藉由研究嚴智怡，來梳理中國新式專業文化官僚是如何建構並利用博物館機制展示中國的過去並創造未來，而成為知識的轉譯者。

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中國南北統一之後，天津博物院改名為「河北第一博物院」，後又改名為「河北博物院」。但在本文中，為避免行文的複雜，一律使用「天津博物院」之名來指稱嚴智怡所創建的博物館。1937年日軍入侵天津之後，天津博物院館藏絕大部份毀損散佚，基本上是一個已經消失的博物館，與1949年之後新成立的天津博物館關聯性不大。因此，本研究僅能藉由天津博物院自1931年9月開始發行的刊物《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及1933年9月起改名為《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1935年1月再度更名為《河北博物院畫刊》之內容，試圖再現天津博物院的行政組織運作、典藏內容、展示規劃，及捐贈者網絡、參觀人數等。另外，嚴智怡編輯的《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與直隸省商品陳列所發行的《直隸實業雜誌》，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文獻，可以從中觀察嚴智怡執行商品賽會及推動實業發展的具體細節。

二、天津博物院的誕生

1923年2月23日，天津《大公報》的本埠紀聞中，簡短報導了位於河北新車站(即天津總站)東的天津博物院即將在兩天後，即2月25日，正式開幕的消息。¹⁵回溯《大公報》對天津博物院籌備過程中的各項簡短報導，我們知道了在1918年6月，博物院籌備處在天津公園的商品陳列所內正式成立，並且在天津公園舉辦為期長達一個月的「成立展覽會」，向天津市民宣告博物院籌備處的成立以及其正在進行的各項規劃作業，同時邀請許多直隸省名流政要出席開幕茶會，建立公共關係，以利博物館未來的經費募款或藏品募集。¹⁶此「成立展覽會」(圖1)，是一個包含動態與靜態展演的城市文化慶典，不僅展示未來將會在天津博物院內出現的部分自然標本與歷史文物展件，並且安排了銅管軍樂隊表演、專家演講、音樂會、魔術、馬戲雜耍、傳統戲曲、武術、電影等表演節目。¹⁷整個展覽會慶典，展示了大清帝國於1911年結束之後、民國時期北洋政府主政至今的7年期間，天津城市的文化風貌。

15 〈天津博物院開幕〉，《大公報》，1923年2月23日，第3張，第2頁。

16 〈博物院開會誌盛〉，《大公報》，1918年6月2日，第3張，第1頁。

17 〈天津博物院之展覽會〉，《教育週報》，第205期，1918年6月3日，頁18-19。

圖 1 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覽會成立紀念攝影



資料來源：《東方雜誌》，15：8(上海，1918)，頁1。

天津博物院是一個因世界博覽會催生的博物館。藉由世界博覽會順勢誕生的博物館，在歐美非常多。博覽會曲終人散之後，就地利用新建置的館舍，陳列大量的博覽會遺存，成為恆常供四方觀者朝聖的博物館。在中國，則有 1929 年西湖博覽會結束之後，成立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等。不過，催生天津博物院的 world 博覽會，並非在天津舉辦過的任何博覽會，而是 1915 年遠在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賽會」(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嚴智怡是中國二十世紀初，少數同時具有世界博覽會策展經驗與博物館管理經驗的專業人才。在建立天津博物院之前，他最重要的策展資歷，是率領中國直隸省代表團全程參與巴拿馬賽會之籌備佈展，並以此參與博覽會過程所累積的策展經歷、文化視野與社會資源，投注在博物館場

域中，締造出天津博物院。當然，三十歲出頭的嚴智怡，其能力與視野並非憑空而來，乃奠基於其顯赫鹽商家族跨世代累積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

嚴智怡的父親嚴修(1860-1929)，是天津現代教育改革家，也是北洋新政時期的核心人物之一，為袁世凱(1859-1916)極為信任的同僚。嚴修於光緒九年(1883)，嚴智怡出生前一年，取得進士。1894年起任職四年的貴州學政，曾大膽奏請以經濟特科取代傳統科舉考試。嚴修身為維新運動成員之一，在光緒皇帝(1871-1908, 1875-1908在位)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暫時辭官回天津故里。在政治生涯失意之時，嚴修轉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維新理念。從其熟習的教育改革工作開始，聘請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的張伯苓(1876-1951)主持嚴氏家塾，並以家塾為基礎，逐步創辦南開新式教育系統，成為南開大學的創始人。¹⁸而進士出身的嚴修，深知傳統科舉知識不足以培養新式人才，因此嚴氏家塾的課程，除了詩書畫印的傳統文人教養之外，還有英語、數學、地理、化學等新式專業科目。嚴智怡是家塾的第一期畢業生。

嚴修家族成員的現代視野與實踐能力，除了因為家塾中西合璧的教育之外，亦得力於多次至日本、歐洲、美國短期考察之經驗。自1902年起，因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大力提倡，直隸省官紳以自費或公費方式至日本短期考察或遊學者，在1902到1907年短短6年之間就高達829人。¹⁹這些東遊官紳帶回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所推動的各項現代化新事物，而嚴修父子兩代，幾乎每位家族男性成員都有日本考察、留學、或工作之經歷，成為嚴家男性成員之間互相分享的社

¹⁸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99-101. 張伯苓後來成為天津南開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¹⁹ 江沛，〈留日學生、東游官紳與直隸省的近代化進程(1900-1928)〉，頁57。

會資本。

1902 年，剛滿二十歲的嚴智怡伴隨其父嚴修與其兄嚴智崇(1879-1918)第一次東遊日本，短期考察日本的現代教育。²⁰1903 年，嚴智怡隨即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就讀，1907 年畢業後至業界實習，1909 年回到中國。因為其應用化學的專業背景，回國後的第一份公職是擔任直隸勸工陳列所的「南洋勸業會出品審查員」，這份工作提供他參與商品博覽會的首次機會。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嚴智怡擔任直隸省實業廳工商科科長，兼商品陳列所所長。²¹這個職務提供嚴智怡在推動實業以扶持具市場競爭性的商品之餘，有機會深入思考「展示」對商業行銷的重要性。

1914 年 10 月至 1915 年 11 月，嚴智怡以直隸賽會代表身分，擔任舊金山巴拿馬賽會期間美術館中國部主任，實地參與了巴拿馬賽會的佈展工作，並藉此機會考察美國各主要城市的博物館與城市建設，對國外博物館陳列展示設計有進一步的認識。嚴智怡團隊成員將賽會期間的旅行考察，留下詳實的記錄，集結成為《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一書，這些考察記錄說明了嚴智怡團隊在美國經歷的文化衝擊、對西方文明的評價、中日兩國現代化的國際競爭，以及對中國未來的規劃願景。

和創辦南通博物苑的前輩張謇比較起來，嚴智怡絲毫未歷經科舉教育，自幼便是在西式現代科學教育環境下養成，以發展實用並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模式為目標；而張謇是進士出身，在中國本有的文人政治與文化框架之中尋思革新突破。從張謇到嚴智怡，兩代博物館規劃者對博物館經營理念的異同，某個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新式教育在廢科

²⁰ 嚴修，《嚴修東遊日記》，頁 1。嚴智崇後來擔任中國駐日使館秘書，於 1918 年病逝於東京。

²¹ 王翁如，〈實業家嚴智怡〉，頁 117-120。

舉之後產生的快速且巨大改變。張謇創立的「南通博物苑」，就某個程度而言，是一個具博物館展示功能的園囿(苑)，仍帶有相當濃厚的傳統文人雅集遺風，藉文化活動織就社會人際網絡，但是尚未形成專業分工的現代博物館管理與策展團隊。²²而嚴智怡則有一群與之合作多年、一起東西洋闖蕩、並能複製經驗的專業團隊，共同執行各式策展與行政事務，包括蒐集、展示、典藏、維修保存、研究、執行社會教育活動等。

三、直隸工藝總局——北洋新政的展示窗

天津是個移民城市，其多元的城市文化，誠如學者關文斌所言，是因為接納了在不同時代因不同原因而不斷移住此地的新來者(newcomer)而形成的。²³自 1860 年起陸續設立九國租界區、1902 年起袁世凱以天津做為北洋新政基地並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以來，整個城市快速擴張並現代化，吸納了大量外省與外國移民。也就是說，嚴智怡即使不出國門，也已經是身處於天津「與世相接」的多元文化脈絡裡。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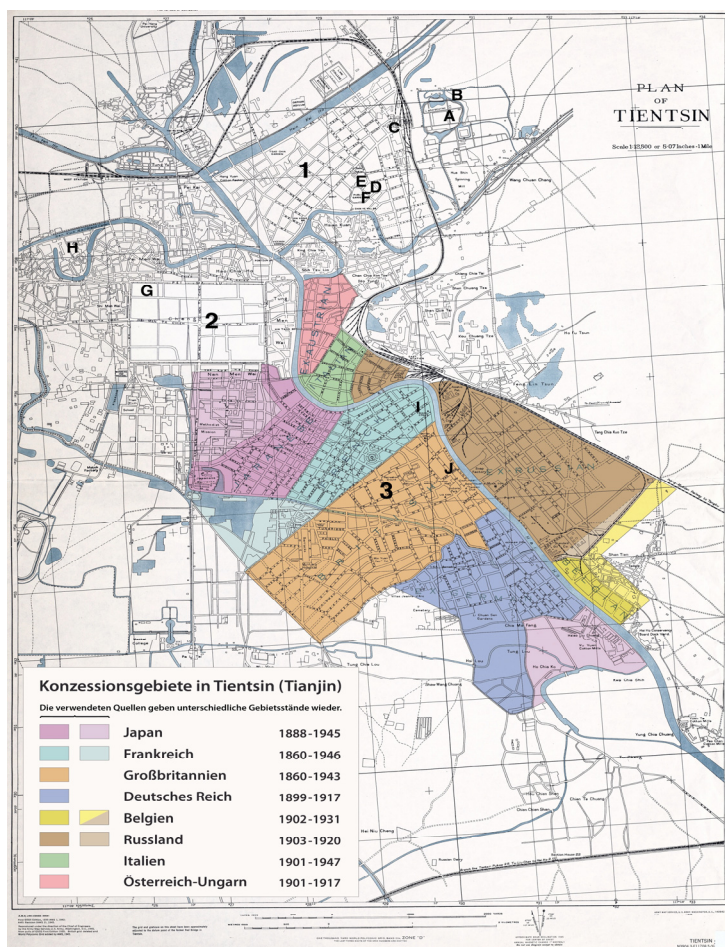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初的天津，以開發歷程劃分，整個城市大致可分為三大部分：舊城區、北洋新區與租界區，這三個不同時期開發的城區，透過逐漸密集的公路與城市輕軌電車交通網絡而串聯起來，成為華洋雜處的大商埠(圖 2)。

²² Lisa Claypool, "Zhang Jian and China's First Museum," 578-579.

²³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26-28。

²⁴ 承蒙本文審查委員之一，提醒筆者此一重要觀點，特此致謝。

圖 2 本文所提重要機構與地點相關位置圖



資料來源：近代天津博物館

1.北洋新區 2.天津舊城區 3.租界區

A.天津博物院 B.天津種植園 C.天津鐵路總站 D.天津公園 E.直隸商品陳列所 F.天津市立美術館 G.天津廣智館 H.水西莊遺址 I.華北博物院 J.北疆博物院

租界區位於天津老城區的東南方海河沿岸，英、美、法、日、俄、德、義、奧、比利時等九國在此執行各式城市地景更新與新式空間生產，包括街區規劃，設置下水道系統、大眾運輸系統、公共展演與休憩空間、新式學校、醫療與社會福利系統、銀行與商務體系等等。天津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多租界區的國際化城市，租界帶來新的觀念與現代城市文化地景，當然，也帶來文化刺激。自 1860 年以來，天津雖然曾發生過三次大規模排外運動，但是對二十世紀初身處於此的部分外國人而言，仍會覺得天津可能是中國各城市中，華人與洋人之間最能夠彼此互相珍賞雙方優點的獨特城市(“But it is at Tientsin where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ppreciate each others’ merits perhaps more highly than anywhere else in China.”)²⁵而中西方並存的衝突與相互好奇探索，形成了傳統與現代、在地性與國際化之間，彼此對照卻逐漸相互融合的二十世紀天津。

袁世凱長期以來以天津為新政實驗基地，為了更新並擴張老城區，1903 年他核准了《開發河北新市場章程》，大規模開發北洋新區，作為新的公共行政及商業區域。所謂北洋新區，是在老城區東北、金鐘河北岸，以新規劃的大經路(即現今「中山路」)為軸線，設置各級政府衙署、公立學校、公共建築、商貿大樓等。²⁶並以新建的天津鐵路總站為中心，周圍分佈了由直隸工藝總局所轄的公共展示空間與實業教育機構，包括種植園，水族陳列館、水產學校、高等工業學堂、實習工廠、考工廠、天津公園、圖書館等。天津原有的世家大族府邸皆在舊城區內，包括嚴家與趙家等。而隨著北洋新區的開發，政府辦公衙署逐漸移至北洋新區內，使舊城區與北洋新區連成一氣，實驗著從西方引進的城市文化與各式現代觀念。而嚴智怡建立的天津博物院，在

²⁵ Tony Burton, *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 9.

²⁶ 繆仲泉，《天津城市規劃》，頁 46-47。

籌備處時期坐落於北洋新區的天津公園內，正式成立之後的博物院新址則在天津總站東舊勸業道署、天津種植園旁。²⁷

除了因設置租界區與實施新政而產生的現代城市空間，加上自明清以來鹽商組織便積極介入社會服務的脈絡，²⁸天津成為實驗地方自治的先驅城市之一，紳商進入議事會或董事會等地方自治體系，形成官僚系統與民間組織的社會整合。²⁹因此，具豐厚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書香家族，如主導南開教育系統的嚴氏家族，便得以利用既有的北洋官僚系統與天津仕紳人際網絡進行社會關係生產，積極投入文化教育工作，聚攏資源以進行文化生產，並主導文化政策的制定與文化資源的分配。

天津博物院並非嚴智怡突發奇想的計劃，而是奠基於直隸工藝總局近 20 載的實際成果之上。直隸工藝總局是推動天津新型實業發展的龍頭，並使天津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各城市中，少數擁有各類型公共展示空間與實業人才培育機構之「創意城市」。1902 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天津，同時接收了聯軍臨時行政機構「都統衙門」，擴充了大清國行政體系下前所未有的新式衙署。³⁰在都統衙門的新式行政架構之下，袁世凱聽從了周學熙(1865-1947)的建議，仿日本工業教育的方法，於 1903 年創設「直隸工藝總局」(以下簡稱「工藝總局」)，「是為全省工學界之樞紐，以創興工藝、提倡實業為宗旨」，由周學熙擔任第一任總辦。³¹工藝總局的整體行政組織架構與硬體設

27 張宗芳，〈河北博物院沿革紀略〉，頁 1。

28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89-103。

29 徐永治，〈論 20 世紀初直隸地區的社會整合——兼評袁世凱與北洋新政〉，頁 2-4。

30 徐永治，〈論 20 世紀初直隸地區的社會整合——兼評袁世凱與北洋新政〉，頁 1-2。

31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自敘年譜〉，頁 590。

施乃參考日本實業教育的做法，並聘請日籍顧問鹽田真(1837-1917)擔任考工廠藝長，傳授「工業教育」與「工業展示」，藉日本經驗，推動工業製造品與工藝美術品進軍世界市場。³²工業教育由「工藝學堂」(後更名為「高等工業學堂」)負責，下屬教養局、實習工廠、勸業鐵工廠、種植園、造紙廠等等，執行工藝傳習與發展新型設計專利等業務。工業展示的業務，則由「考工廠」與「教育品製造所」，這兩個「類博物館」行政單位負責，以執行社會教育並促進工商發展，成為天津博物院の先行典範。

工藝總局轄下的「考工廠」(或稱「勸工陳列所」，即後來之「直隸商品陳列所」)，是一個商品展示館，展示著收集自國內外各地具商業價值之創新商品，其設置宗旨為「考察本國外國商品，以激發工業家之觀感」，³³「為各貨物開拓銷路」並「為各鋪家播揚名譽」。³⁴在考工廠內陳列的商品包括當代教育品、美術品、工藝製造品、機織品、農林漁礦產等等，參觀者必須購買門票入場，並得以購買展場上的展示商品。除了展示之外，考工廠並定期舉辦實業發展講座、專家諮詢、產品評比、產品內容化驗、產品寄售、創制專利權核准，以及工商博覽會、商品拍賣、彩卷發行販售等業務。有當代學者認為，考工廠是

關於直隸工藝總局的檔案，見郝慶元，〈直隸工藝總局資料選編〉，頁1-78。

³² 1903年赴天津擔任考工廠藝長的鹽田真，是日本著名現代美術團體「龍池會」成員，1880年《工藝叢談》的創刊號編輯，同時是巴黎萬國博覽會的審查員。見徐蘇斌，《近代中國建築學的誕生》，頁38。

³³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天津考工廠試辦章程〉，頁54。

³⁴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天津考工廠各項規則〉，頁61。

中國第一個博物館。³⁵但是就展示特點而言，考工廠與現代語境下以典藏與策展為知識生產方式的「博物館」並不完全相同，比較類似「世貿中心」兼「商品標準局」，以展售方式行銷並鼓勵產品創新與大眾消費，同時接受廠商的寄售品，是一個有官方背書的商品販售平台。

帝國末期活力十足的北洋新政，主政官僚嘗試各種新制度以促成「勸業」與「勸工」，提升國貨的產業競爭力，以面對大量進口商品所引發的貿易逆差問題。自 1906 年起，天津考工廠的重大工作項目之一，是每年的十月初十日萬壽聖節前後，向全國徵集優秀商品，於「勸業會場」（即後來之「天津公園」）舉辦為期一周的「勸工展覽會」。³⁶除了年度的貿易商展之外，為了鼓勵天津在地的商業活動，考工廠亦在天津李文忠公專祠設立「勸工會場」，在每月的初一與十五，以及端午、中秋、春節假期等，舉辦假日市集，商家可以擺攤售貨，販賣食物、日用品、玩具、織品衣物、教育用品、書籍、古董字畫等等。³⁷不管是貿易商品大展性質的「勸工展覽會」，或是假日市集類型的「勸工會場」，都是以開發市場交易為導向的消費型展示，以促成製造生產端的技術與觀念革新。

工藝總局轄下的「教育品製造所」兼陳列館，是北洋新政新式教育用品的製造兼展示窗口，以作為與舊式科舉教育的對照。³⁸產品包

35 陸惠元，〈天津考工廠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頁 82。

36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天津勸工展覽會章程〉，頁 126-127。

37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為在李文忠公專祠舉辦勸工會場事致津商會函〉，頁 132-133。

38 1903 年，直隸工藝總局成立之初，分成「教育品製造所」與「教育品陳列館」。至 1904 年兩個單位合併，總稱為「教育品製造所」。見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直隸工藝總局詳陳列館擬併名為教育品製造所文並批〉，頁 83。

括地理和歷史教育品、理化儀器、博物標本、各科目之教具、教材與統計圖表、行政規章等等，並設展場對外售票開放參觀，首任所長是與嚴修家族密切往來的趙元禮(1868-1939)。³⁹教育品製造所除了告知天津市民新式教育內容，同時也向大眾展示後科舉時代必須經過哪些專業訓練，才能走上學而優則仕的公職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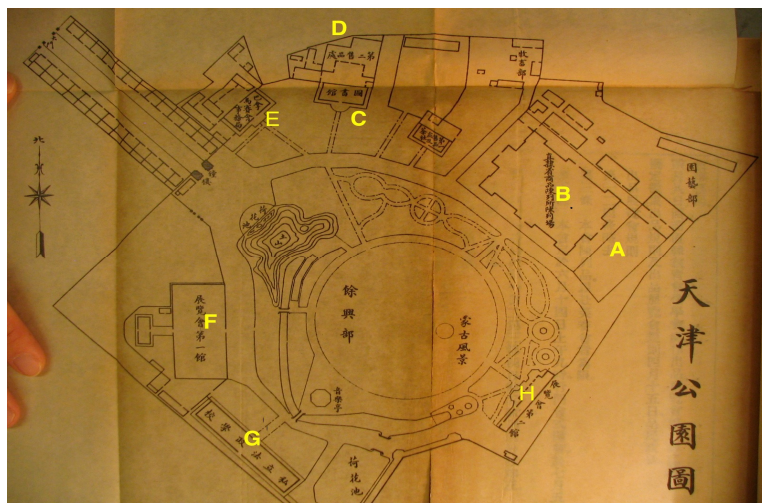
「勸業會場」於 1906 年建制完成，工藝總局轄下各單位，才有專屬公署。勸業會場在工藝總局的規劃下，「勘定大經路中州會館北首地二百餘畝，先建罩棚茶座，后漸事佈置，築亭台池榭，取名勸業會場，備各界觀游之所。」⁴⁰佔地廣大的勸業會場，除了作為休閒公園之外，並於其內興建教育品陳列館、教育品製造所、勸工陳列所(即考工廠的辦公地點)、直隸圖書館等。⁴¹至 1907 年，勸業會場已然成為北洋新政「實業救國」思維下特別設置的「城市文創園區」，透過官方輔導、制訂生產與貿易規範，建構在地商品生產、展會行銷的國貨產業鏈。1912 年，勸業會場改名為「天津公園」，未來的天津博物院籌備處與天津市立美術館館址，亦在此公園內(圖 3)。

39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直隸工藝總局教育品陳列館試辦章程〉，頁 77-75。

40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自敘年譜〉，頁 594。

41 徐蘇斌、青木信夫，〈創造近代公共空間——清末新政時期天津河北新聞區勸業會場建設〉，頁 390-391。

圖3 天津公園圖



說明：A. 原直隸學務會所，天津博物院籌備時期藏品暫居於此，後為天津市立美術館所在。B. 原勸工陳列所、後為直隸商品陳列所。C. 直隸圖書館 D. 教育品陳列所 E. 教育品製造所 F. 直隸出品展覽會第一館 G. 原北洋譯學館，後為私立法政學校。H. 直隸出品展覽會第二館

資料來源：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冊，頁13。

四、直隸省商品陳列所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直隸工藝總局更名為直隸實業廳工商科，考工廠改名為「直隸商品陳列所」，由俯自日本留學回國的嚴智怡擔任首任工商科長兼任直隸商品陳列所所長。⁴²延續周學熙對工藝

⁴² 陸惠元，〈天津考工廠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頁84。

總局的擘劃，嚴智怡到任之後，除了繼續進行工藝傳習的「勸工」政策外，更積極推動商品陳列所成員深入直隸各縣境，以了解民間百工發展現況，對直隸全境工、農、礦、商、生態資源、產業生產鏈、經濟貿易網、運輸網、文物古蹟等，進行普查並搜集實物標本或照片，建構直隸地區的經濟地理知識庫。嚴智怡到任後，並延攬樂嘉藻為陳列課主任，⁴³陸文郁為陳列課員，⁴⁴李裕增為調查課主任，⁴⁵華學涑(1871-1927)為編輯課長，⁴⁶這幾人皆成為未來天津博物院的主要團隊成員。

這個團隊執行的第一個多年期大型計劃是「直隸實業大調查」，以田野調查的方式，使成員深入理解在地歷史風土知識，將傳統「金石志」與「考工記」的知識系統化、科學化、普及化，深入理解直隸地區天然物產的特性與人造產品的技術脈絡，並發展出對應的商業模式以產生商業利益。實業大調查的具體成果以報告書的方式集結成冊，一部分則以專文方式發表在《直隸實業雜誌》上。在這些成果報

⁴³ 樂嘉藻是貴州人，具舉人身份，應是嚴修擔任貴州學政時之同僚，1907年主辦貴州初級師範簡易學堂、任貴州省教育總會會長。巴拿馬賽會後，他開始著手整理中國建築史料，於1934年出版《中國建築史》，是中國建築史學第一本通論專書。

⁴⁴ 陸文郁是專業畫家，生物學者，曾擔任天津《醒俗畫報》、《人鏡畫報》編輯，生物研究會會員，熱衷於採集生物標本。天津博物院的天然部展覽，主要皆出於陸文郁的專業意見。見陸惠元，〈陸辛農先生年譜〉，頁166-188。

⁴⁵ 李裕增亦是貴州人，與樂嘉藻等人一同創辦貴州初級師範簡易學堂，生卒年不詳。他的田野調查報告觀察細膩，有相當多文章刊於《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

⁴⁶ 華學涑，天津人，具「舉人」身份，古文字學者，1920年擔任天津博物院籌備主任，後任副院長。見陸惠元，〈天津博物館事業的拓荒人——華石斧〉，頁101-109。

告中，調查員們提出相當多至今仍有效的建議。例如，華學涑在〈直隸特產亟謀輸出議〉專文中，對於直隸生產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低弱問題，提出在「製造、保存、選拔、包裹、裝潢、標識」等方面之具體改進意見，從產品設計、生產品管、包裝、品牌行銷、市場調查等方面下手，使「土貨」品質升級並標準化，才能進軍國際市場。⁴⁷李裕增則提出〈直隸實業根本計劃意見書〉，認為「吾直有須全力拼死命以注重經營者，凡四：棉紗布、牧羊、山林、治河」，前兩項是直隸風土條件下適合發展的農牧業，後兩項則是山林水土保持與河川保育治理工作，李強力譴責「墾山地、搜掘樹根燒炭、盜伐樹木、燒山」等殺雞取卵的土地利用方式。⁴⁸而調查完直隸各縣歷史古蹟名勝之後，李裕增提出「歷史商品為發揚國粹促進市榮之唯一要素論」，拋出「歷史古蹟商品化」的可能性，將過去方志知識脈絡下的「金石志」調查與書寫紀錄，具體轉為文化遺產保存與經營管理的先聲，開拓小型市鎮的文化觀光。⁴⁹這些經過細緻踏查之後而提出的專業意見，皆針對在地產業的永續經營，至今讀來仍頗具開創性。

事實上，二十世紀初進入共和體制的中國，各省官方與(各國)民間社群紛紛在中國各地從事各式各樣的地毯式調查工作，是大規模的資源盤點，不過大部份的調查報告都因為太過瑣碎與專業而埋在檔案庫房裡。而嚴智怡掌握了展示工具，經過選擇與拼貼瑣碎的調查資料，得以再現一部分調查成果，將調查報告內的文字，轉化為大眾能理解

47 華學涑，〈直隸特產亟謀輸出議〉，《直隸實業雜誌》，3：1(天津，1914)，頁 1-20。

48 李裕增，〈直隸實業根本計劃意見書〉，《直隸實業雜誌》，3：2(天津，1914)，頁 1-11。

49 李裕增，〈歷史商品為發揚國粹促進市榮之唯一要素論〉，《直隸實業雜誌》，2：10(天津，1913)，頁 1-8。

的實物圖解百科全書，進行公開展示。從筆者目前能取得的資料，無從得知直隸商品陳列所的展示細節。不過，大致可以從其任內發行的《直隸實業雜誌》，推測直隸商品陳列所的可能展示內容與展示方式。《直隸實業雜誌》是為推展工商實業教育而出版的官方雜誌，內容包括：宣導產業法規；表列國外重要原料的進口價格、中國原料的出口數量與價格；翻譯國外刊物所報導的市場行情、物產調查報告、與商業行銷宣傳手段等等；從現代科學角度分析，重新詮釋中國古籍裡所記載的工藝、農藝、礦產等知識與技術改良，說明各式物產知識技術的創新用途；介紹日常基本的化學與物理常識，以破解過去江湖術士各類令人不解的「魔術祕技」等等。在地方產業的推動上，《直隸實業雜誌》報導的焦點之一是對「土法」（相較於「新法」或「洋法」）生產方式的科學說明，可說是奠基於傳統「考工」的科技知識敘述之上，但是加入了大量的科學數據，以分析優劣及適用時機，發展適用的商業模式，而非全盤否定「土法」。例如，華伯荃在〈土法煉焦〉一文中，詳細描述煉焦工序與設備需求，在最後評論中說到：「此法最適用於小礦場，以成本輕得利厚也。既大礦雖已用新法，煉焦之處，其洗煤機傾棄之物，仍可淘洗以此法燒煉爨焦。……如按柴煤價值出售，除去運費尚得倍利。兩相比較，價同火強，且為普通用品絕無候銷擱本之虞，願當業者留意焉。」⁵⁰另外，《直隸實業雜誌》每一期還包括以插圖和照片為主的「圖畫」專欄，大致可以推測直隸商品陳列所的具體展示方式，應該是以圖表、照片、標本、模型等，配上通俗的文字說明，為大眾展示一部工商實業與應用科學之圖解百科全書。此展示模式，深深影響未來天津博物院的展示規劃。

⁵⁰ 華伯荃，〈土法煉焦〉，《直隸實業雜誌》，3：5（天津，1914），頁5。

五、巴拿馬賽會——博物館館長的職前訓練

1913年，嚴智怡任直隸實業廳轄下的商品陳列所所長，同時兼任直隸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局長，這兩個職務開啟了他往後結合博覽會概念以規劃公共博物館的契機。巴拿馬賽會參展經驗，是嚴智怡建構天津博物院是直接動力，同時讓他有機會釐清，在實業救國與文化救國的脈絡下，公共博物館如何發揮社會教育功能？該展示什麼？如何展示？

在進軍美國巴拿馬賽會前，嚴智怡團隊成員先就日本舉行的博覽會和各種博物館、陳列館、商場等，進行田野考察。1913年，樂嘉藻、李裕增、楊育平被派赴日本，參觀大阪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並考察日本大東京地區的主要博物館。⁵¹1914年4月，嚴智怡親率直隸代表團參加在東京舉辦的大正博覽會，並身為大正博覽會直隸賽會事務局的主持人。嚴智怡團隊似乎並未對大正博覽會投入太多資源，因為真正的國際戰場是在美國的巴拿馬賽會上。不過，大正博覽會讓嚴智怡團隊有了第一次國際博覽會的參展實務經驗，並且考察日本為參與巴拿馬賽會的各項準備工作。大正博覽會結束之後，嚴智怡團隊隨即在1914年6月14日至7月17日，於天津公園舉行直隸地區巴拿馬賽會的預展，即「出品展覽會」。這是嚴智怡團隊策劃的第二個大型展覽，工作內容包括徵集展件、展品審查分類、展場規劃、會場佈置與上展、公關宣傳、展覽期間各式演出活動安排、與場地時程控管等等。為期

⁵¹ 樂嘉藻，〈民國二年赴日本調查陳列所報告〉，《直隸實業雜誌》，3：7（天津，1914），頁11。楊育平當時是直隸工業試驗所所長。直隸工業試驗所是直隸實業廳下的單位，與商品陳列所平行，專門負責商品內容科學化驗業務。

一個月的預展，參觀人數幾近十萬，嚴智怡團隊有了實際的博覽會策展以及與大量觀眾互動的經驗。⁵²

從籌備預展到正式前往舊金山參展，過程中各項瑣碎的行政事務，嚴智怡團隊必須與「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以下簡稱「事務局」）溝通協商。事務局是中國參與巴拿馬賽會各項事務的統籌機構，統整當時中國各省所推出的賽會參展品與策展團隊，由具有豐富博覽會經驗、出身浙江青田的陳琪(1877-1925)擔任事務局的總主持。然而，嚴智怡團隊似乎在許多行政細節上，與陳琪團隊意見不合。嚴智怡曾就展品驗收、編目、報關、整理包裝、運輸、拆箱、上展等各項工作細節的效率與改進之道多所討論，抨擊事務局行政管理系統極度缺乏效率的前現代特徵。⁵³再者，在巴拿馬賽會期間，嚴智怡對陳琪的許多決策不滿，兩人多所磨擦，致使嚴在舊金山會場佈展時公開批評中國館建築的粗制濫造簡陋寒酸等等，並引發了中外媒體對此事的關注。⁵⁴嚴智怡對陳琪團隊的行政細節疏失以及其所引發的問題多所評論，並將之公開發表，或許隱含了地域派系政治之爭，不過，如何發展出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策略，確實被納入民國官僚的競爭論述中。⁵⁵

⁵²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冊，〈預會誌略上卷〉，頁4-17。

⁵³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2冊，〈預會誌略下卷〉，頁5-7。

⁵⁴ Susan R. Fernsebner, "Material Moderniti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 1876-1955," 145-195.

⁵⁵ 巴拿馬賽會結束後，1916年，農商部總長谷鍾秀在國務會議上提出彈劾陳琪一案，批評陳琪在賽會事務局長任內「糜費太巨」且「報告不實」。1917年，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決議處分陳琪「應受褫職非滿八年不得開復」。見〈王僉事返京覆命〉，《申報》，1916年9月10日，第10版；〈谷鍾秀糾參陳琪〉，《申報》，1916年10月13日，第6版；〈命令〉，《申報》，1917年3月2日，第2版。陳琪雖然抗辯但是無效，此後，

在整個參展過程中，曾經身為留日學生的嚴智怡體認到，與已經取得「東亞文明代表」的日本相較，中國正面臨傳統精華快速流失、卻也未跨入現代進步的危機裡。這危機清楚地表現在中國政府館的建築形式與視覺效果上。根據嚴智怡〈預會誌略〉中引用的不知名參觀者之評論，此政府館聲稱模仿紫禁城太和殿的建築樣式，但是便宜行事犧牲品質，「瓦用鐵皮」，「豎板圍壁，以朱綠塗畫假為窗櫺之狀，此在中等人家所不屑用，鄉村社廟江湖戲棚或有此耳，木工草率畫工俗陋色料更為粗浮而雜亂」，⁵⁶致使「美人之來觀者，輕蔑之狀尤為顯露……甚至執國人而問之曰：『代表貴國文化之建築，抑僅此乎？』」⁵⁷相對而言，日本政府館「仿其國金閣寺及富清古宮，工料之精整，與在國內者相等，裝飾優美無懈可擊」。面對觀眾的藐視或質疑，嚴智怡不得不承認「我[中]國建築學向無專科，多數工程悉出俗工之首，官廳經手者尤形草率，工粗料薄是為故常。」⁵⁸嚴智怡引用的對中國政府館建築嚴厲批判之文章，或許陳述出一部分實情，因為對政府館建築物的類似批評意見，亦可見於屠坤華的《萬國博覽會遊記》一書內。⁵⁹當然，陳琪籌備巴拿馬賽會的整體經費預算，只有 24 萬美金，卻要「以最小之經費，攜最多之出品」，捉襟見肘之下，不得不犧牲政府館這個臨時建築的品質，致使出身津門世家的嚴智怡覺得汗顏，因為「[我國]如是龐大國家，與世界之人相接觸，一事不備，皆足惹人訛議」。⁶⁰

除了中國政府館建築在巴拿馬賽會中頗令嚴智怡覺得丟失顏面

具有豐富國際博覽會經驗的陳琪便失去政治舞台。

56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2 冊，〈預會誌略下卷〉，頁 11。

57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2 冊，〈預會誌略下卷〉，頁 9。

58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2 冊，〈預會誌略下卷〉，頁 11。

59 屠坤華，《萬國博覽會遊記》，頁 160-161。

60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2 冊，〈預會誌略下卷〉，頁 11。

外，中國參展團此次準備了 442 件參賽作品欲在美術宮(Palace of fine arts)中展出，其中包括了 112 件繪畫與素描類作品，330 件工藝美術類作品。即使這 330 件工藝美術類作品最後得以在美術宮內展出，卻都因為不符合西方對「美術」的定義，賽會當局與中方代表協商後，皆改由「工藝宮」(Palace of Varied Industries)委員審查，而非美術宮委員審查之。巴拿馬賽會美術宮參展作品的條件是「限於繪畫雕刻兩種且須有獨立性質者，如畫一幅或雕像一座。……不得仿他人成器，若有模仿亦失獨立性質。」即使中方最引以為豪的作品，如沈壽的「耶穌像」刺繡等，「在美人目中，亦不認為美術」。因為「刺繡者依樣本而組織，非自由揮灑者」，而且「耶穌像所用樣本，即為普通之畫片」，並不符合「獨立」之美術創作。⁶¹這個決議，讓中國參展方非常難以接受。⁶²

十九世紀以來的歷次世界博覽會，特別是在英法兩帝國殖民競爭的脈絡中，彼此競賽的項目不只是工業科技上所展現的現代文明高度，同時也以「美術」作為象徵文化深度的終極競技場。1904 年，在慈禧太后授意下，以貝子溥倫(1869-1925)，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等人，率領大清國代表團參與美國的聖路易世界博覽會(St. Louis World's Fair)，大清國沒有任何作品進入代表人類精神文化極致表現的美術館裡。而當時日本的美術類參展品，卻擺滿了 7 個展廳，其

⁶¹ 審查權移轉至工藝宮委員，也同樣發生於日本美術宮的參展作品。中日兩國因為「美術」觀念與歐美不同，故聯合與賽會主辦單位協商。嚴智怡，〈預會誌略下卷〉，收入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2 冊，頁 17。

⁶² 沈壽是張謇力捧的刺繡總教習，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女性刺繡工藝家，見 Grace Fong,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58.

中一個展廳甚至全是西洋風格的作品。⁶³大清國在這一回的美術競技場裡，完全無法與日本競爭。而巴拿馬賽會，是中國第一次在世界博覽會美術項目中參與競賽。美方雖給中國官方代表團一些妥協，但相較於美方對日本美術的肯定，卻是望塵莫及。

嚴智怡感受到的中國美術參展受挫，部分亦來自西方專業藝術批評家之見解。Eugen Neuhaus(1879-1963)的 *The Galleries of the Exposition* 一書，詳細分析了巴拿馬賽會美術宮各國展品的優缺點，全文由樂森壁翻譯成中文，收錄於《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中。根據嚴智怡的說法，之所以將此書全文翻譯並收錄，是因為直隸代表團內沒有任何美術專家可以在參觀各國美術宮展出之後，寫出完整專業的調查報告，因此以譯文代替，才不會落入「強不知以為知者也」的傲慢。⁶⁴ Neuhaus 對中國美術宮參展作品評價甚低，「入中國各陳列室，最初之感想即令人失望。所陳之物毫無生氣，近今仿品極多，彼似謂古來所有之美術已臻絕頂，無改進之餘地。」但是，他對日本美術宮參展品的評價卻甚高，「然日本維新進步之精神，可藉其雕刻繪畫以窺見之者，中人於此乃大缺乏。故中人今日之美術，純然古昔之所留遺者也，與新建共和國之精神殊不相類。」⁶⁵顯然，在巴拿馬賽會上，日本已成功取得東亞悠久文明的代表權，既守住傳統，又能創新。日本向世界宣

⁶³ Carol A. Christ,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675-709.

⁶⁴ 見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冊，〈預會誌略上卷〉，頁28。不過，賽會期間歐美藝術評論家所寫的文章甚多，有些對中國參展作品亦帶有相對正面的評價，而嚴智怡特地選定了 Eugen Neuhaus 的文章進行翻譯出版，顯然是極為同意其看法。

⁶⁵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3冊，樂森壁譯，〈美術館參觀記〉，頁14。原文見 Eugen Neuhaus, *The Galleries of the Exposition*, 38-39.

稱的是，現代日本之所以進步神速，並不是與日本傳統切割，而是根植於傳統文化內涵中的高度秩序感，因此，在會場上，日本自信的展現其精緻傳統文化的各項細節。⁶⁶Neuhaus 也對日本現代美術參展品細緻的物體結構觀察、構圖精巧勻稱、色彩分明，既能創新卻又不脫離日本美術傳統等特點，歸結為日本學校科學與藝術教育的成功。⁶⁷日本的參展策略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吸引目光，畢竟美國觀眾想看的並非在日常生活中習見的現代事物，而是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日本文化。

建築與美術參展品不符合西方文明標準而被訕笑或剔除，以及 Neuhaus 對中日美術發展差異的批評觀點，促使嚴智怡回到天津之後積極建置天津博物院，企圖對參觀者進行藝術教育，重新認識中國建築與美術。就建築而言，嚴智怡提出「西人之論建築者，謂中國建築式樣單簡，惟屋頂之結構頗為複雜，且多美麗之裝飾，此亦國人所宜注意者也。」⁶⁸因此樂嘉藻開始對中國建築屋頂結構進行研究，寫成科普式論文〈中國建築屋蓋考〉，連載於《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並制作建築模型，於博物院內展出。嚴智怡亦投身天津著名園林「水西莊」的保存計畫，在天津博物院內以特展方式重現傳統園林的悠久

⁶⁶ Abigail Markwyn, "Economic Partner and Exotic Other: China and Japan at San Francisco's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457.

⁶⁷ Eugen Neuhaus, *The Galleries of the Exposition*, 36.

⁶⁸ 嚴智怡，〈預會誌略上卷〉，收入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冊，頁14。嚴智怡對中國建築特色的意見與信心，或有可能受到巴拿馬賽會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天主教耶穌會孤兒院所出品的中國百座木塔模型之影響。這套百塔模型，是傳教士根據中國各地重要的百座寶塔建築實地測繪及攝影資料，並以孤兒院院童的木工與彩繪技術，所製成的木造模型，連寶塔上的縮小彩繪都栩栩如生。這套百塔模型並牌樓參加教育宮競賽，並得到大會最高頭等大獎章。嚴智怡稱譽此作品「國中所有塔式迥為搜遍，用功之勤不可及也」，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2冊，〈預會誌略下卷〉，頁17。

歷史。⁶⁹而針對中國美術議題，嚴智怡以田野採集或徵集的方式，擴充博物院內的中國傳統美術類館藏，並積極協助胞弟嚴智開(1894-1942)於1930年創立天津市立美術館，將博物院的美術類館藏移撥給美術館，使之成為衍生自天津博物院的美術教育基地，也是中國第一座官方美術館。天津博物院儼然成為嚴智怡對西方社會質疑中國文明成就的辯解成果。

巴拿馬賽會期間，嚴智怡更重要的任務是新大陸旅行考察，作為博物院建制的準備。為期近一年的美國經驗，加深了嚴智怡對於「現代化展示」(modernized exhibition)以及「展示現代化」(exhibiting modernization)的信念。身為直隸實業廳的主管之一，嚴智怡參觀了許多大型製造業工廠與商業組織，包括肥皂廠、屠宰廠、農業機械廠、鋼鐵廠、銀行、證券交易所、報館、小學、商品陳列所及電影廠。嚴智怡在旅行日誌中詳細記載資本額、製造流程、員工分工方式、工資、產品內容、產量、運輸、機械設備、廠房空間配置、銷售通路等等質化與量化說明。他在美國期間的另一個觀察面向，是包括芝加哥、匹茲堡、費城、紐約等各主要城市的博物館。他詳細記錄美國著名博物館的人事組織架構、經費來源、會員制度、導覽狀況、展覽空間安排、陳列手法、展件來源、藏書空間及音樂表演廳設施等等。且嚴智怡還與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所創設的卡內基博物館之館長進行了短暫晤談，以了解博物館內部的運作與經營理念，也參觀了一些工業學校，藝術學校等等。這一趟旅行下來，他對未來如何經營天津博物院有了較具體的藍圖，並留下完整的考察記錄，可以視為一個博物館館長的職前訓練日誌。在博物館學尚未成為專業教育的一環時，他透過實地

⁶⁹ 嚴智怡，〈天津芥園水西莊專號序言〉，《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第49期，1933年9月25日，第1版。

考察美國的博物館，與美方博物館工作者進行對談，為往後經營天津博物院的工作鋪路。

嚴智怡對費城商品陳列館(The Philadelphia Commercial Museum)印象深刻，在考察日誌中盛讚費城商品陳列館是「美國之對外貿易及實業教育，實為其主張而綱維之，蓋可為美國之靈魂，世界之模範」。⁷⁰參訪此之後，嚴智怡特別攜回此館所贈的實業教育標本一組，後來展示在直隸商品陳列所內。並取得費城商品陳列館出版的 *Commercial Raw Materials* 一書，責成直隸商品陳列所翻譯成中文廣為流傳。⁷¹

費城商品陳列館以 1893 年芝加哥哥倫比亞博覽會(Columbian Exposition)結束後所累積的博覽會展品為基礎，以成為「永久的世界博覽會」為目的，典藏品都是歷次世界博覽會上的展示商品。至 1900 年為止，費城商品陳列館典藏的非美國製造之商品已超過 20 萬件，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帝國歷史形成過程中最具代表性之博物館，任務在於搜集並展示世界上每個地區各式各樣的原物料與天然物產，研究其商業、經濟與科學價值，或者其對文明世界的用處。⁷²費城商品陳列館成立的目的，是使美國大眾理解美國有實力可以掌控世界其他地區，但是不需要透過歐洲殖民模式，而是要對世界其他產業文化有充分的理解，以促成商業貿易擴張，美國就可以成為一個以商業貿易為武器之二十世紀新形態帝國。⁷³費城商品陳列館展示的方式，是以國家或區域為分類原則，再現世界各國或各地區重要手工

⁷⁰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14 冊，〈東美調查錄〉，頁 49。

⁷¹ 原書為 Charles Robinson Toothaker, *Commercial raw materials: their origin, preparation and uses*.

⁷² Steven Conn,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146.

⁷³ Steven Conn,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115-150.

物產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不只是展出各國的特有產物，而是展示其制作脈絡。以立體蠟像與實物，呈現從原料或半成品到成品的生產過程中之某製造環節，與所需之機具，形成一個個用玻璃櫥櫃包裝起來的立體靜態展示，每一個玻璃櫥櫃裡就是某一產品生產鏈環節中的3D立體插圖，並附有通俗文字說明，使觀者穿梭在展櫃之間，有如在觀看世界各地產品製造流程之立體百科全書。根據嚴智怡的觀察，費城商品陳列館的組織架構主要有三大部份。第一部分是掌管「調查蒐集存儲研究」與「陳列」，世界各地之物產必須研究清楚並確認其用途功能之後，才會予以展示。第二部分掌管教育，定期向社會大眾與各級學生舉辦演講、製作實物教學標本並出借。第三部分掌管貿易訊息流通，提供國內外貿易業者各種所需資訊，並設置關於國際「地理、製造、統計」等書籍之圖書館。⁷⁴費城商品陳列館的「研究、展示、教育、應用」功能，對嚴智怡的展示與教育理念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六、「闡明文化，發揚國光」的天津博物院

自美返國之後，嚴智怡在其民國十年10月10日國慶日所寫的〈巴拿馬賽會直隸關會叢編序〉中，明言提到世上各文明國度的能力、思想、精神等成就，可分為四種位階等級，最下等為「能創造文明而尚缺整理之能力者」，第三等為「雖不能創造而因襲他人，合其固有，而能整理得法者」，第二等為「能創造兼能整理者」，第一等為「精力絕人，其所成就迥異尋常者」。他認為中國在世界文明發展成就位階上，是屬於「能創造文明而尚缺整理能力者」之最下等，因為中國

⁷⁴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4冊，〈東美調查錄〉，頁49。

一向「閉戶以處，目空一世，及出，而與世相接，始知其前此之狂陋」。他期待其賽會經驗，可以提供「有志整理中國文明者，或可用為參考之助」。⁷⁵而天津博物院正是他為要「整理中國文明」而建立的實踐場域。

天津博物院的出現，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密切關連。根據嚴智怡自述，他之所以發起天津博物院籌備計劃，源於「民國四年，智怡歸自美國巴拿馬博覽會，攜有美洲紅人用品，將在津籌設博物院，用為陳列品」。⁷⁶因此，嚴智怡去世後，《河北博物院畫刊》第 97 期的紀念專號上，除了報導嚴智怡對天津博物院的各項貢獻之外，並「附以公所獲印第安人事物影片，為紀念專號。」為何從巴拿馬賽會帶回的美洲印第安人用品，會成為建立天津博物館的動機？因為「印第安人，人類學者謂與黃種同源，以文化低落，日就式微，近殆絕跡于世。公取其風俗事物，詔示國人，觀者宜知所警惕。」⁷⁷就是要提醒國人，在演化論下，若不求文明進步，就會被淘汰。

巴拿馬賽會結束之後，嚴智怡從美國返回中國，1916 年升任直隸實業廳長，天津博物院籌備處也在他的主導之下，正式在直隸商品陳列所內成立。籌備兩年之後，1918 年 6 月，嚴智怡與其團隊在天津公園舉辦了「天津博物院成立博覽會」，仿照巴拿馬賽會模式，為博物館的正式開幕與募款熱身。1923 年，天津博物院正式開放，分「天然部」與「歷史部」展示區，嚴智怡是第一任院長。博物院的經費來源

⁷⁵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 1 冊，〈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序〉，頁 2。

⁷⁶ 嚴智怡，〈本院沿革要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1 期，1931 年 9 月 25 日，第 4 版。

⁷⁷ 〈故院長嚴持約先生紀念專號發刊詞〉，《河北博物院畫刊》，第 97 期，1935 年 9 月 25 日，第 1-4 版。

除了直隸實業廳以其預算的 1%按月補貼之外，董事會是一個重要的經費來源，並且主導正副院長的產生。⁷⁸不少天津地區的收藏家與紳商名流都是天津博物院的董事，除了贊助博物館營運經費之外，並捐贈或寄陳個人收藏，形成一套因博物館而建構的城市文化菁英人際關係網絡。

以美國許多著名私人博物館組織架構為藍圖，天津博物院作為獨立的博物館，以「民辦公助」(state related)的經營模式成形。所謂「民辦」，是利用社會既有的結社組織動力，以天津士紳所組成的董事會為核心，決定博物館的財務規劃與專業屬性。所謂「公助」主要來自於嚴智怡所主導的直隸實業廳之人力與行政資源，在他職權可動員的範疇內，部分挹注這個新誕生的博物館，但是並未在實業廳底下另外設置一個行政單位主掌天津博物院。天津博物院的行政組織是相對獨立於公部門之外，讓董事會發揮主導權。這樣的民辦公助經營模式，是因為嚴智怡當時得不到直隸省官方對博物院計畫的全力贊助支持，只好轉向民間與教育界尋求贊助。在官方不願意支持的情況下，嚴智怡應用在美國考察博物館之後得到的啟發，大力借用天津城市既有的紳商社會參與網絡，也順勢擺脫官僚體系缺乏行政效率的窠臼。

嚴智怡對天津博物院的想像，是具強烈社會教育功能的一般型博物館，傳輸能「闡明文化，發揚國光」的科普知識。他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的發刊辭上提到「本院乃普通之博物院，而非專門之博物院，其天職，蓋在闡明文化，發揚國光，以輔助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之不逮，所負之使命至重且大也。」⁷⁹作為現代學校教育之輔助，

78 嚴智怡，〈本院沿革要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2 期，1931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79 嚴智怡，〈發刊辭〉，《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1 期，1931 年 9 月 25 日，第 1 版。

天津博物院的參觀者，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是免購票入場參觀的學校機關團體。

那麼，在嚴智怡理念中哪些物品能向大眾展演「文化」與「國光」呢？天津博物院籌備處對外徵集物品的種類包括：動物、植物、礦物及岩石、化石、禮器、貨幣、簡書、符牌、璽印、陶瓷、武器、舟車、建築、日用器、衣服、配飾、農器、漁獵器、工用器、方仗用器、宗教用器、喪葬婚娶用器、古蹟風景相片、風俗相片、世界人種風俗、度量衡、掌故及紀念等項目。⁸⁰ 從這個徵集物件種類清單來看，是以一套具象化的民間日用類書或萬寶全書為概念基礎，借用普羅大眾習以為常的物件分類系統，與觀者溝通。博物院初期陳列品的分類方式，在此徵集系統基礎上稍作簡化，仍是民間日用類書內習見的分類方式。在 1917 年所發行的《天津博物院陳列品說明書》中，將徵集到的所有物品，分成天然部與歷史部兩大部分，天然部之下分動物類、植物類、礦物類；歷史部之下細分為美術類、貨幣類、人種風俗及古蹟風景類、文字類、掌故類、科舉類、紀念類、禮器類、宗教類、武器類、陶瓷類。⁸¹

對嚴智怡團隊而言，傳統日用類書記載的知識系統，是中國過去文明的具體證據之一，而且最容易被普羅大眾接受。不過，嚴智怡也理解傳統日用類書的知識系統，雖是方便法門，但是現代社會教育機構必須超越傳統日用類書的知識系統，要能有「整理」這些文明物件的能力，而博物館的管理職責(curatorship)便是呈現整理文明之後的成果。所謂「整理」，是客觀化物品可見的外部材質，以進行科學分類與客觀描述。「眼見為憑」的科學觀察與地方知識描述，是現代博物

80 〈本院徵集物品分類及手續〉，《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1 期，1931 年 9 月 25 日，第 4 版。

81 天津博物院籌備處，《天津博物院陳列品說明書》。

館整理文明的工具。因此，天津博物院內的展示架構，逐漸發展成經過科學整理之後的日用類書。1931年9月1日，天津博物院全部展覽廳終於規劃策展完成並全部開放，「綜計陳列物品分自然歷史二部，分其類，曰植物，曰下等動物。哺乳動物、鳥、魚、爬蟲、進化、兩棲、礦石、岩石、化石，皆屬於自然者也。文字、宗教、掌故、科舉、鉅鹿出土宋代器物、骨器、石器、玉器、陶器、金器、瓷器、紀念，皆屬於歷史者也。」⁸² 很明顯的，這個「自然」和「歷史」兩大展示分類系統，較前述日用類書式的徵集分類系統，較強調展品的材質屬性，而非內容或用途。從內容用途分類系統轉移至材質屬性分類系統，可以使物件從過往慣常的單一使用情境中被解放出來，人們會因此發現同一物件可以有多元的分類與使用方式，並產生創意的使用情境，是實業發展所必需的知識管理技術。

七、展示風格

天津博物院並非二十世紀初天津唯一的博物館，因此，如何與天津其他的博物館持續合作交流，但仍發展出自身的展示特色，是館長嚴智怡必須考慮的。整體而言，天津博物院的展示風格，企圖在大眾知識應用推廣與學院科學研究的典範之間，尋找一個折衷的平衡點。本節將就天津博物院的自然部展示，說明其與天津租界區內的兩個博物館之異同。⁸³

⁸² 嚴智怡，〈本院沿革要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4期，1931年11月10日，第4版。

⁸³ 至於歷史部展示，可與天津廣智館、天津市立美術館等進行比較。1925年成立的天津廣智館，是舊城區內唯一的博物館，並與天津博物院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陸文郁更長期擔任廣智館董事。而1930年成立的天津市立美術館，可謂天津博物院的衍生機構，嚴智怡將大部份的美術精品館藏移

早在 1902 年，英國倫敦教會在天津新學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內，設立了一座學院附屬展覽館——華北博物院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主要藏品為自亞洲及非洲各地搜集到的動植物、地質及礦物標本，1904 年正式對外界開放，是天津最早的博物館。⁸⁴1905 至 1906 年期間，華北博物院館長是著名的英國自然史學者蘇柯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⁸⁵目前，無具體資料顯示嚴智怡或其家族成員與新學書院間的往來。不過，以嚴家在天津的人脈優勢，要特別參訪華北博物院並非難事，與嚴家極為要好的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亦曾任新學書院董事。⁸⁶根據新學書院華籍教師涂培元的回憶口述，其眾多特色館藏中，包括罕見的甲骨片與鯨骨架標本。⁸⁷而甲骨片與鯨骨架，剛好也是天津博物院引以為傲的特殊館藏。

1919 年 4 月，一尾座頭鯨死去擱淺在寧河縣聖頭沽岸邊，嚴智怡團隊獲報後，由陸文郁負責在海岸邊當著圍觀群眾之面，實地鑒定並解剖死去的座頭鯨，將鯨肢解後運回天津市金華橋畔的金華商場，為市民舉辦三天的「觀鯨會」。在座頭鯨展示會場的說明牌上，除了敘述鯨的生理構造之外，並詳述鯨的經濟價值與民生應用。⁸⁸嚴智怡團隊在「觀鯨會」上的展示理念，乃企圖轉化過去的「觀奇」成為「科

交給美術館。但因為文長關係，此部分將另外以專文討論。

⁸⁴ 關於新學書院博物館的館藏內容，見該館 1900 年出版的導覽手冊，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Guide to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⁸⁵ Sowerby 對上海博物館的發展影響深遠，見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頁 344-346。

⁸⁶ 張紹祖，〈天津新學書院簡史〉，頁 52。

⁸⁷ 涂培元，〈天津新學書院的形形色色〉，頁 480-481。根據涂培元的描述，華北博物院的這副鯨骨架，在日本佔領天津之後，被移至天津博物院。

⁸⁸ 嚴智怡，〈本院沿革要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2 期，1931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陸惠元，〈陸辛農先生年譜〉，頁 174。

學式觀察」。觀鯨會結束之後，鯨骨並製成標本繼續陳列在直隸商品陳列所後方的戶外空間，並於 1932 年 12 月，隨著天津博物院擴充 5 間新陳列室，亦將此鯨魚骨架移入室內展場。⁸⁹

另外，1922 年創立並在 1928 年正式對外開放的北疆博物院(*Le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兼地質學家的桑志華(*Emile Licent, 1876-1952*)主持。此館另一著名研究者，是地質學兼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北疆博物院有極為先進的系統性古地質與古生物演化展示，展品多為兩位學者在華北地區多年辛苦收集來的動物植物礦物，以及考古人類學標本。⁹⁰是近代中國科學史上具有世界知名地位的自然科學史博物館，並有強大的實驗室、圖書館等研究設備。⁹¹

目前，筆者尚未發現文獻資料具體載明天津博物院與北疆博物院之間的交流合作關係，但是天津博物院陸文郁等人曾參觀過北疆博物院，是毫無疑問的。⁹²然因兩館屬性不同，吸引的觀眾群勢必有所區隔。在展示內容上，北疆博物院是一研究典藏型的博物館，每週只對外開放 12 小時。展品的學術研究性極強，並附設專業級圖書館，吸引自然史學者。展示牌皆以法文書寫，因此一般大眾需要館方專員導覽才能知其精要，否則可能會有「所得無幾」之嘆。⁹³而天津博物院在商品陳列館、世界博覽會的展示脈絡下，以推廣大眾科普知識為目標，著力於地方自然產業知識，展演出一套屬於在地的自然與民生應用史觀。例如，對於陳列品「多羅波蟹」(*Lithodidae Camtschatica Tilesius*)的

89 〈本院重要紀事〉，《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43 期，1933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

90 關於北疆博物院的展示細節，見陳善者等，〈視察北疆博物院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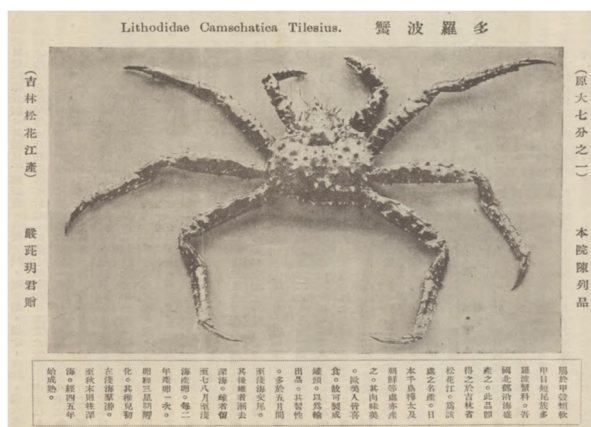
91 戴麗娟，〈在「邊緣」建立「中心」——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

92 允，〈參觀北疆博物院〉，頁 4。

93 允，〈參觀北疆博物院〉，頁 5。

說明中提到：「屬於甲殼類軟甲目短尾族多羅波蟹種，吾國北部沿海盛產之，此品即得之於吉林省松花江，為該處之名產，日本千島及朝鮮等處亦產之。其肉味美，歐美人皆喜食，故可製成罐頭以為輸出品。其習性，多於五月間至淺海交尾」⁹⁴(圖 4)。在這段說明裡，除了物種學名與分佈習性之外，展演企圖是在中國當時的民生經濟脈絡裡，特別強調這種蟹的出口經濟價值，與嚴智怡嚮往的費城商品陳列館之展覽概念吻合。

圖 4 天津博物院多羅波蟹陳列品



資料來源：《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8 期，第 3 版。

在展示風格上，北疆博物院的展示企圖，是科學系統性的物種演化法則，將各式標本有秩序的置放在純白或無背景的玻璃櫃或小木盒內，如實驗室般的明亮整齊乾淨有序，以及「一切櫥櫃裝潢周密不落灰塵」的「現代性」。⁹⁵除了標本，及一些重要的年代圖表，與標本

⁹⁴ 〈多羅波蟹〉，《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8 期，1932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⁹⁵ 允，〈參觀北疆博物院〉，頁 5。

採集區域分布圖之外，無過多其他訊息。而天津博物院所標榜的全景陳列法(panoramic display)，是參照巴拿馬賽會的展示手法，由陸文郁設計生態佈景箱，提供許多展件本身以外的周邊訊息。⁹⁶

陸文郁是個職業畫家，業餘生物學家，他的畫作風格融合了中式花鳥畫的形式，與西方博物畫的寫實。陸文郁的畫學啟蒙於張兆祥(1852-1906)，在畫學革新的潮流之下，張兆祥結合攝影技術與中國傳統花鳥畫，俾使花鳥在形態顏色上具立體真實感，也以照相機觀景窗取景法，尋找構圖的合理透視。⁹⁷陸文郁自張兆祥畫室出師之後，擔任北洋師範學堂日本博物學專家大津先生的生物插畫工作，並從其學習生物學知識與研究方法。⁹⁸同時，陸文郁與友人發起「生物學研究會」(1908-1911)，一個專供業餘興趣者學習生物學的自學團體，並發行《生物學雜誌》。1912年嚴智怡接掌直隸商品陳列所之後，陸文郁便加入嚴團隊，從事直隸地區實業大調查，在1914年赴日參加大正博覽會，參與中國直隸省商品的陳列佈置工作。1914年底同嚴智怡赴美參加巴拿馬賽會，參與策展陳列工作。陸文郁並負責考察記錄賽會期間各國美術館的裝潢，以為往後天津博物館展覽設計的參考。⁹⁹

從職業畫家轉進博物館裝潢陳列的陸文郁，其主導的全景陳列法主要是用在動物的展示上，以模型佈景道具，模擬出一個符合科學透視的自然環境舞台，使展出的動物標本搭配其原生的天然環境，形成一種虛擬實境。另外，當三維空間的全景陳列法無法達成時，會以田

⁹⁶ 陸惠元，〈陸辛農先生年譜〉，頁173。

⁹⁷ 何延喆，〈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天津繪畫〉，頁31。

⁹⁸ 陸惠元，〈草木有緣潛心人——記陸文郁先生〉，頁36。

⁹⁹ 陸文郁，〈美術館裝潢記略〉，收入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第10冊，頁1-13。

野調查過程中所攝的平面照片作為替代，使用大量的視覺再現或文字再現，形成「畫報性展示」手法。也就是說，觀者走進天津博物院，感覺上比較像是瞬間進入多元視覺媒材拼貼出來的立體畫報空間。不過，這樣的展示手法，因為放入太多展示品本身之外的訊息，亦可能招致負面評價。例如，天津市立師範學校的學生們參觀天津博物院之後，在其報告書中提到：

其最惡劣亦即同學所同感者，即為動物標本之背景，皆欠美的成分，大多一個過於帶著市井氣息，惡劣背景的襯托，使觀眾有低級趣味的感覺，對於欣賞方面，研究方面均有影響。如：玻璃櫃內襯以與標本絲毫沒有關聯的山水，油漆匠的江湖味十足，此即為此次參觀中所感的大缺點，希主其事者有所改善。否則寧可不襯，例如北疆博物院，廣智館中陳列品之毫無襯托，或襯以白色都非常之妙。¹⁰⁰

這些與北疆博物院、廣智院比較之後所得的「市井氣息」、「江湖味」、「低級趣味」、「寧可不襯」負面評價，或許說明了 1930 年代，天津城市內性質相異的博物館群，已經足以提供市民複雜而多元的視覺經驗，在普世科學之精簡現代主義，和融合中西方花鳥博物畫傳統之裝飾主義的展示光譜中，個人可就其品味與需求，進行評價與選擇。

八、天津博物院的捐贈者網絡

作為一個新興的城市博物館，天津博物院成立時，除了經費來源之外，最大的限制(或優勢)是缺乏館藏。初期主要是從直隸商品陳列所舊有展品中，挑選出少數具歷史文化科學價值的舊藏。由於典藏品甚

¹⁰⁰ 孫欲光等，〈視察河北博物院報告〉，頁 138。

少，因此，館方主動蒐集並鼓勵大眾捐贈，以擴大典藏品數量，是博物院成立初期極重要的工作項目。物品徵集的方式主要有三類，一是其他公部門將所屬公物「移存」至天津博物院；二是「寄贈」，私人收藏者將物件所有權完全轉移給博物館，寄贈品經過專家鑑價超過二百元以上者，即可擔任天津博物院董事；三是「寄陳」，即博物館可以陳列展示但收藏者仍保留所有權，未來可以取回。¹⁰¹至 1931 年，天津博物院的總藏品已累積至「一萬六千九百餘事。寄陳品得其什六，寄贈購置之品，各居其十之二焉」。¹⁰²館方購置之品僅佔五分之一，其餘五分之四皆為收藏家「寄陳品」或「寄贈品」。亦即，天津博物院因為缺乏館藏，而順勢建構出一個捐贈者網絡，而且重要的捐贈者享有監督與指導博物院營運之權利，使收藏家得以透過捐贈進入董事會系統，進行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交換。¹⁰³

根據《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的〈本院重要紀事〉專欄，從民國 20 年至 24 年(1931-1935)為止，天津博物院共累積約 400 條(包括個人與機關團體)的藏品捐贈或寄陳紀錄；每條記錄至少是捐贈或寄陳一件物品，有些紀錄則一次捐贈或寄陳高達 50 件以上的物品。從捐贈者名單以及其所贈與之物，大致可以看出天津博物館館藏的建立，聯結哪些不同領域的捐贈者，以塑造館藏基調。以下將以個人捐贈者之背景與人際網絡，分析天津博物院的成立，牽動了哪些既有的社會關係，並且展演出哪些不同的人文向度。

101 〈本院徵集物品分類及手續〉，《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2 期，1931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102 嚴智怡，〈本院沿革要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4 期，1931 年 11 月 10 日，第 4 版。

103 〈本院徵集物品分類及手續〉，《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2 期，1931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天津博物院工作團隊成員，包括嚴智怡、李貫三、陸文郁、華學涑、姚彤章(1874-?, 品侯)等人，是捐贈者名單中最常見的一群。特別是嚴智怡，歷次捐贈或寄陳的物品總和超過 500 件。嚴智怡捐贈或寄陳的物品名單中，包括國民政府主席譚組庵(譚延闓，1880-1930)國葬紀念品八件、上海猶太籍地產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之訃文，¹⁰⁴大量動植物標本、國外風景名信片、鐘鼎彝器照片、石刻墓誌拓片，以及陶瓷青銅泥塑等完整古器物或殘片。從這些物品名單看來，一部分循著過往業餘金石學家的收藏實踐，以物件的史料價值為重點，同時，也呈現了當代日常史料的概念，小至紀念郵票、紀念幣、鐵路信封、訃文等，都是蒐藏並捐贈之對象。嚴智怡去世之後，嚴家並以「嚴宅」名義將與嚴智怡相關之紀念品捐出，作為天津博物院創立者之紀念。

活躍於天津的藝文界名人，是捐贈者名單上另一群主要組成人物，是天津博物院之所以能在這個城市存在的最主要贊助支持者。細究這些人物的背景，乃透過血緣、地緣、婚姻、世交、或社群團體等不同機制，與天津博物院產生贊助關係。嚴家其他成員，包括嚴臺孫、嚴新百、嚴智開(1894-1942)等人，都出現在捐贈名單內。另外，嚴智怡繼承了嚴修的人際關係網絡，因此捐贈名單中與嚴修主持的城南詩社成員多所重疊，集結了以嚴修為首的天津文人宿儒，包括李金藻(1871-1948)、俞品三、陳寶泉(1874-1937)、趙元禮(1868-1939)、劉雲生、劉雲孫、羅蘊章、張果侯、張德孫、張鈞孫等人。而這批詩社成員，也是其後水西莊遺址保存委員會的主要成員。

王漢章(1892-?)共有 5 次捐贈記錄，是著名殷墟甲骨文收藏家王懿

¹⁰⁴ 〈本院重要紀事〉，《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6 期，1931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嚴智怡並不以其名進行捐贈，而是以其字號「慈約」或「莼珥」，作為捐贈者之名字。

榮(1845-1900)之子。王漢章本身亦是金石學家與收藏家，與其兄王崇烈(?-1918)長期居住於天津，是天津金石甲骨文字研究圈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天津有非常堅實的甲骨收藏研究傳統，因為王家兄弟、王襄、孟廣慧都在天津，形成殷墟書契與金石古文字研究社群。¹⁰⁵天津博物院亦極支持在地的古文字研究社群，《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從第一期開始就以長期連載方式，發表了王崇烈的遺稿《種瓜亭筆記》、王漢章的《古董錄》、王襄的《簠室題跋》等著作，內容皆為金石甲骨書畫考釋或收藏的個人經驗。

另外，有一些外地的捐贈者，似乎與嚴修家族舊有的人際網絡關聯性不大，亦非天津既有的文化社群成員。這些捐贈者，或許出於認同天津博物館的理念而贊助，同時亦藉此擴大個人在其專業場域之影響力。如活躍於北京美術界、湖社畫會會長金開藩(1895-1946)有五筆捐贈，包括鸚鵡卵、蛾蝶標本、銅牌飾，以及其父金城(1878-1926)過世之後的一只鼻煙壺遺物和金城墓誌銘拓片；活動於上海的葛虞臣有三筆捐贈紀錄，包括古銅幣、鄉試試卷等；以及，活動於廣州的談月色(1891-1976)有5筆捐贈紀錄，也是唯一的女性捐贈者。

¹⁰⁵ 甲骨文的發現對天津文化圈有非常重大的影響，世居天津的孟廣慧與王襄(1876-1965)，和當時在北京的王懿榮，皆是率先收購甲骨片之研究者。張利軍，《甲骨文史話》，頁6。

圖 5 談月色，南越瓦當拓片



參考資料：《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18 期，第 3 版。

談月色在 1932 年 9 月捐贈了「唐開元天寶鉛萬[寓]錢九枚、晚周六朝蠟封拓本二十紐、玉虎拓本、明奇文砂壺拓本、清御製耕織圖詩墨拓本各一張、南越殘瓦當拓本二張」；同年 10 月捐贈「廣西風景照片三張」；1933 年 4 月捐贈「元林九牧銅印，南漢殘陶器底，南越瓦錐，文信尼刻竹臂閣等拓片四種」；同年 9 月捐贈「漢碑拓本一冊，商廣鼎、朱耶佗人銅鼓拓本各一張」；1935 年 1 月捐贈「廣州百花冢石刻拓本七張」。除了 9 枚鉛錢為實物之外，其餘主要為拓片及少數照片。物品皆為捐贈，不是寄陳。從其中一件刊登於《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的有足南越瓦當拓片得知，談月色職銜為「廣州博物院發掘專員」，拓片上有題詞曰「寄天津博物院並希采入半月刊為幸」，明確要求發表方式(圖 5)。而同一件南越瓦當的另一拓片，談月色亦將之發表于 1932 年的《藝林月刊》上。¹⁰⁶顯然，談月色為同一件瓦當制作了多套拓片，並廣泛地尋求發表空間。因為《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每個月都有〈古物消息〉專欄，轉載各大報紙所報導的古蹟古物考古發掘訊息，因此談月色選擇在此期刊發表，並捐贈拓本作為館藏。

精於詩書畫印的談月色具有多重身份，而她特別挑選了「廣州博物院發掘專員」這一社會身份作為天津博物院的捐贈者。這些拓片應是她與其夫蔡守(1879-1941)擔任發掘專員過程中的田野採集成果，以拓印方式製作副本寄贈廣州之外的其他博物館，可以算是考古田野成果的發表形式之一。¹⁰⁷民國初年，學術性科學考古尚在起步之初，博物

¹⁰⁶ 〈漢南越殘瓦當〉，《藝林月刊》，第 34 期，1932 年 10 月，頁 16。

¹⁰⁷ 精於詩書畫印的談月色，是民初廣東嶺南文化界的傳奇女性，畫尼文信的再傳弟子，自小成長於廣州檀度庵，十五歲時剃髮為尼，後遇廣州著名文人蔡守(哲夫)，遂還俗並與之結縭，遊走於在南方文人圈。陳志雲，〈畫尼文信《山水冊》考釋——兼談蔡守談月色伉儷與諸家的交誼〉，頁 121。

館是官方執行田野調查與發掘的主要單位之一，雖然當時絕大部分的博物館員並未有科學考古學的訓練。蔡守夫婦從傳統金石學知識脈絡出發，成為業餘考古家，進而與專業考古學者結合，長年關注南越王墓葬群的發掘工作，可以說是傳統金石學者透過自學而轉型為考古學家的典型代表人物。蔡守主導的黃花考古學院，是一個民間考古學會，得到廣州博物院授權，主持廣州貓兒崗南越墓葬群搶救發掘，撰寫發掘報告。¹⁰⁸而談月色將這批拓片寄贈天津博物院，可以說是考古學術知識的分享與社群串聯。藉由成果分享與社群聯結，蔡守夫婦或能為其南越墓葬群的研究成果，取得專業認同與話語權。而天津博物院於 1920 年曾派館員李詳耆、張厚璜參與河北鉅鹿金代古墓的搶救發掘，鉅鹿出土器物是其館藏品中極具特色的一群典藏。品。¹⁰⁹這或許是蔡守夫婦願意與天津博物院分享其考古發掘成果之原因。二十世紀初從西方引進中國的專業考古學逐漸成熟之後，成為國族論述的一環，李濟等專業考古學者把精力放在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上，使得夏商周三代以降的墓葬發掘倍受忽視。而位在三代華夏文明邊陲地區的廣州天津等地方博物館與業餘考古家聯結，不把精力放在夏商周三代，較願意搶救在地的晚期墓葬、蒐羅晚期器物，並且以既有的博物館機制展示具邊陲性的在地歷史演變，與中原文化核心對話。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藝術史已進入藝術創作理論極為多元而豐富的時代，歐陸傳進來的西洋古典與現代繪畫概念持續的被轉化應用著，與之並存的是強調詩書畫印文人涵養的傳統文人畫、以金石學知識入畫並佔有極大市場的海派、強調保存國學國粹的「中國畫」、以西洋技法融入中國畫的嶺南折衷派、「國畫」與「新國畫」概念的出

¹⁰⁸ 徐堅，《暗流——1949年前安陽以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頁 109-122。

¹⁰⁹ 嚴智怡，〈本院沿革要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2 期，1931 年 11 月 10 日，第 4 版。

現、以及許多女性專業藝術家浮出檯面等等。這些藝術創作理念及與之相應的畫派出現之後，並非取代彼此，而是各派同時並存並且持續變化中。為了傳播藝術創作理念，各派皆有其代表人物、實踐平台、發聲管道等等。而一個新成立的博物館，在百家爭鳴的藝術論爭中，成為各家理論與實際成果都能展現併呈的藝術傳播平台。不同藝術理論立場的捐贈者，主動的透過捐贈物，在博物館這個新興的文化傳播平台中，鞏固自己的藝術主張，所以金城父子的國粹派、談月色的女性金石家角色、陸文郁的生物學「科學美術」等等，都得以透過天津博物院的捐贈系統，取得發言與對話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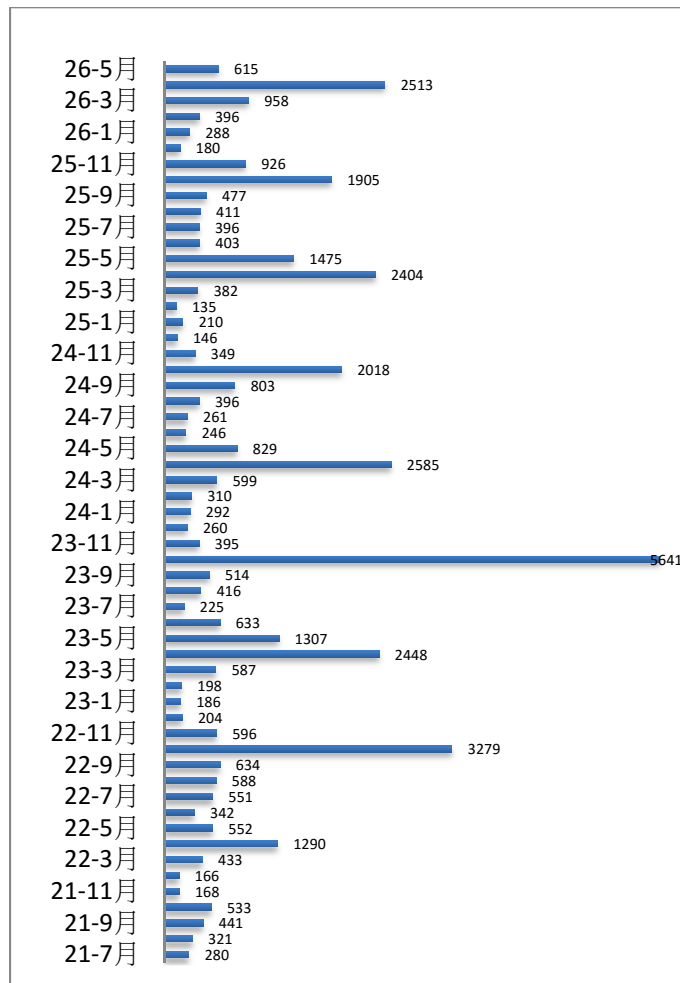
九、天津博物院的影響與貢獻

天津博物院作為嚴智怡整理並展示中國文明的場域，究竟發揮了多大的社會教育功能？1918年6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為期兩個月的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覽會，博物院館舍雖尚未完成，但有臨時的陳列館與各種展演遊藝活動，兩個月間的總參觀人數達28,900人，每月平均參觀人數是14,450人。¹¹⁰但是這樣的參觀熱潮在天津博物院正式開幕之後未再出現。根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7月至二十六年(1937)5月的統計資料，在這57個月內，該院總共參觀人數是46,096，平均每月參觀人數只有809人(表1)。其中學校機關團體預約參觀與國定假日免費入場者佔32,874人，個別購票參觀者佔13,034。主要參觀主體仍是天津地區各公私立機關團體職員與學校師生，偶有外省或外國學者遠赴天津交流參訪。每年的10月雙十節、1月元旦、4月清明節、兒童節等因免購票入場，參觀人數會單日暴增。例如，民國二十三年的雙十節當日參觀人數便達4,075人。¹¹¹

¹¹⁰ 涂小元，〈天津近代博物館概覽〉，頁211。

¹¹¹ 〈本院重要紀事〉，《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77期，1933年11

表 1 天津博物院月參觀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本院重要紀事〉專欄，《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24 期，
1932 年 9 月 10 日至第 139 期，1937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

月 25 日，第 4 版。

與當時中國其他博物館比較起來，天津博物院參觀人數的確不多。以 1926 年於瀋陽故宮設立的東三省博物館為例，1929 年四月至 1930 年六月間的參觀人數高達 69,000 人次。¹¹²位於北京紫禁城的文物陳列館，1932 年的參觀人數是 72,936 人，即使古物南遷後的 1933 年，全年參觀人數仍可達 51,262。¹¹³當然，以上兩座博物館都是以清朝皇室收藏為主體，在影響力上絕非一個靠徵集捐贈品構成的城市博物館所能企及。然而天津博物院的參觀人數，亦少於其他省立博物館甚多。例如，雲南省立博物館於 1931 年 1 月份當月的總計參觀人數是 29,717 人¹¹⁴，同年 2 月份總計參觀人數是 8,664 人。¹¹⁵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 1934 年度的總參觀人數高達 178,543 人。¹¹⁶而天津的城市人口數絕對高於杭州與昆明，1930 年代左右的天津市區加上郊區總人口超過 130 萬人，與北京相當，是當時中國城市人口數超過百萬的五大直轄市之一。¹¹⁷而從天津《大公報》上所刊載的各項大眾娛樂消費事業廣告，包括電影院、劇院、百貨遊樂場等，可以推估這個城市具有一定程度的大眾文化消費市場，很難想像天津博物院的每月參觀人數只有 809 人，平均每天不到 30 人。因此，單純從參觀人數顯示，嚴智怡雖然想透過典藏展覽，「詔示國人」以進行社會教育，卻無法產生足夠的社會影響力。就現有資料來看，本文尚無法深入回答是何原因導致天津博物院的參觀人數如此之少。是因為展覽不佳？博物館行政管理機制不當？票價太貴？還是，1930 年代的天津人並不那麼重視

112 遼寧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遼寧省志統計志》，頁 711。

113 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頁 29。

114 〈雲南省立博物二十年一月份所售各種參觀票銀數人數統計表〉，頁 23-24。

115 〈雲南省立博物二十年二月份所售各種參觀票銀數人數統計表〉，頁 16-17。

116 〈二十三年度本館參觀人數統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頁 58。

117 張利民，〈近代華北城市人口發展及其不平衡性〉，頁 195。

一座城市博物館？或有其他原因？

筆者就能取得的 1930 年代 3 座有省級公部門經費支援的博物館資料，初步分析影響天津博物院參觀人數之可能原因(見表 2)。在人力資源上，與他館並無明顯差距；在展場面積上，天津博物院絕對不如西湖博物館的規模，但兩層樓共 20 個陳列室的北洋時代官方新建物，應該不至於與原本是文廟的廣西博物院相差太大。¹¹⁸但是在行政管理層次上，大致可見以下三項關鍵因素，影響了天津博物院的參觀人數。一是每週開放時間過短；二是票價過高；三是博物館年度經常費用相對較少，以致無法舉辦教育推廣活動吸引參觀者。

天津博物院的開館時間，原本每週只有週四與週日兩天，冬令時間從早上 9 點至下午 4 點，夏令則早上 8 點半至下午 5 點半，開館供民眾購票參觀，總開放時數每週 14 或 16 小時。直至 1936 年 10 月 15 日，為了增加參觀人數，改為每週開館 5 天，但每天仍然只有下午時段開館供民眾參觀，冬天為下午 1 點至 4 點，夏天則延至 5 點半，每週開放總時數為 15 小時或 22.5 小時。¹¹⁹從參觀統計數據來看，因為開放時數增加幅度不大，人數並未因此明顯增加。而西湖博物館開放時間每週 6 天，每天共 7 小時，每週總共開放 42 小時。因此，天津博物院開放時間明顯較西湖博物館少了一半。

至於天津博物院的票價問題，學校團體參觀免購票，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參觀者無需購票。而一般民眾票價銅元 10 枚，自 1935 年後

¹¹⁸ 劉炎臣，〈記河北博物院〉，《大公報》天津版，1935 年 5 月 5 日，第 16 版。各個博物館的展場面積，並無實際具體長寬大小數據資料，僅能就文獻資料中提到的陳列室數目進行比較。

¹¹⁹ 〈河北博物院增加展覽日期每週改為五日〉，《大公報》天津版，1936 年 10 月 15 日，第 6 版。

才降為銅元 6 枚。¹²⁰而西湖博物館是完全免費參觀。¹²¹

整體而言，開放時間較短及票價高的問題，與天津博物院能取得的穩定經費較少有關。從表 2 所見博物館可取得的經常費來看，天津博物院自 1932 年度以來，河北省庫撥給的經常費僅有 9,756 元，而西湖博物館 1933 年度的經常費可高達 39,450 元，將近天津博物院的 4 倍；1934 年度預算刪減至 19,878 元，但仍是天津博物院的兩倍以上。因為經常費不足之故，天津博物院教育推廣活動經費必得另外申請補助。例如 1936 年舉辦的「益農動物」與「從簡冊說到線裝書」兩場通俗講座，必須另外向河北省教育廳申請特別費用。¹²²整體而言，天津博物院雖然有董事會募款所得之部分援助，但募款來源會隨著天災人禍而不穩定，可謂慘淡經營。

表 2 1934 年度三座省級博物館參觀人數、經費、編制比較

館名	每週 開放 天數	每週 總開 放時 數	票價	陳列 室 間數	參觀人數 年度統計	年度經費	正 式 人 員 編 制	資料來源
天津博物院	2	夏令 18 小 時 冬令 14 小 時	銅元 10 枚	20 間	12,312	9756 元/ 年	16 人	〈記河北博物院〉、〈視察河北博物院報告〉、〈華北二博物院參觀印象記〉

¹²⁰ 〈河北博物院民國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2:2(北京，1936)，頁 19。

¹²¹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概況〉，《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頁 17。

¹²² 〈河北博物院民國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2:2(北京，1936)，頁 19。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	6	42小時	免費	至少十棟建築物	178,543	39,450元 / 年(1933) 19,878元 / 年(1934)	17人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概況〉、〈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二十二年度館務紀要〉 〈二十三年度本館參觀人數統計〉
廣西省立博物館				13間	88,774	18,704元 / 年	17人	〈廣西省立博物館近況及過去工作〉

然而，嚴智怡早期籌劃過的大型商品展覽會，參觀人數似乎都不錯，讓他因此有信心從博覽會轉進博物館。例如，1914年6月14日至7月17日在天津公園的「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共計91,079人參觀，人數頗為可觀。¹²³不過，官方舉辦的商品博覽會基本上吸引大量在地或外來紳商、投資者、商品製造與經營者，與城市博物館的主要參觀客群，有明顯區隔。而作為一個工業城市，1930年代天津的工業人口佔總人口數的40%，且有大量因華北天災或戰禍而被迫離開農村的外來移工與貧民階級，至1931年，天津全市的貧戶數高達70,266戶；而1930年天津的無業人口為329,344人，佔人口總數的35.15%。¹²⁴或許，快速工業化且吸納大量農村移居人口的天津城市，至1930年代尚未有足夠比例的願意付費之文化消費人口來利用博物館與美術館的文化教育資源。即便在地仕紳結合文化官僚投注心力建立博物館群以典藏並展示文化物件，但在「想要生產更多對在地文化知識與中國文明成就有認同感的現代市民」一事上，效果似乎有限。

另外，從博物院運作期間的各項專業出版物，可見其典藏與研究之貢獻，集中於歷代金石文字學與明清以降的近世歷史文物。除了自

¹²³ 〈巴博直隸出品展覽會紀實展覽會紀實〉，《直隸實業雜誌》，3：9(天津，1914)，頁1。

¹²⁴ 付燕鴻，〈近代城市貧民階層的形成與時代特徵——以近代天津為中心的考察〉，頁82。

然部與歷史部的常設展之外，天津博物院曾辦過兩個重要特展，一是與中國營造學社合作的明代岐陽王世家文物展，一是天津在地古蹟芥園水西莊遺址文物。博物院的研究出版品包括文字學的《福山王氏劫餘印存》、《簠室殷契類纂》、《簠室殷契徵文》、《秦書八體原委》、《秦書集存》；金石考古類的《鉅鹿宋器叢錄》與各類碑銘拓片；科普與美術教育類的《縱橫線圖案》、《兒童應用動植物圖譜》等等。縱觀以上的特展與出版品項，天津博物院的文化傳播對象仍集中於專家學者與文物收藏家等，而非從事農工商業的普羅大眾。

十、結語

一座博物館的誕生，集結眾參與者累積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包括館長、策展人、董事會成員、搜集者、捐贈者、參觀者、收藏家、批評家、研究者等，從建館概念的發軔、館址的選定、建築空間設計、公共關係的建立、典藏品的蒐集、到策展規畫與佈展執行等，共同展演了一部連結時間縱深、空間範疇、與人的行動之歷史。這一連串博物館建構行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歷史文本，交織著物的歷史、觀念、政治、空間，與個人複雜糾結的專業經歷。

在「實業救國」並「文化救國」的框架下，嚴智怡以博物館管理者(curator)的職權與知識技術(curatorship)，創造出博物館的社會空間，以及對天津文化地景的未來想像。他帶著從博覽會節慶活動策劃的成功經驗，轉進博物館經營管理，主持或催生了在天津北洋新區內的三座博物館：商品陳列館、天津博物院、天津市立美術館，結合不同類型的展品，進行意義的共構，讓工業產品、歷史文物、精緻美術品三者之間，互相為彼此的價值背書，企圖使「實業」成為「文化」的物質基礎所在，而「文化」成為「實業」的精神依歸。

晚年的嚴智怡仕途並不如早年順遂，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在政局紛亂的情況下，讓天津博物院易名為「河北第一博物院」，並取得河北省政府的經費支持，得以順利營運下去而未解散，同時促成天津市立美術館的建制完成。此後，嚴智怡本人轉而像個傳統金石學者般，於 1933 年親自執行河北 14 縣古蹟古物調查工作，留下細緻的田野記錄，並將採集之田野標本典藏於一手創辦的博物院內，作為「整理中國文明」的具體實踐。¹²⁵並且大力推動水西莊園林古蹟保存運動，欲完成其父嚴修的遺願，與天津文人士紳共同成立「天津水西莊遺址保管委員會」，設法保存天津老城外西北方的著名清代園林，以便未來闢為供市民遊憩的公園。¹²⁶雖然水西莊的古蹟保存運動，因為 1935 年嚴智怡盲腸炎手術意外失敗過世以及隨之而來的戰亂，並沒有多大進展，但是至少初步蒐集了一批與水西莊相關的文物與文獻，作為後世重建該園林的參考依據。從實業踏查開始蒐集史料遺存，到水西莊的完整遺址保存規劃，嚴智怡這位開創性的博物館館長，為當代天津的文化遺產保存，預留了重要的伏筆。

(本文於 2015 年 8 月 16 日收稿；2016 年 8 月 25 日通過刊登)

¹²⁵ 嚴智怡，〈河北十四縣古蹟古物調查紀略〉，《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第 79 期，1934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¹²⁶ 嚴智怡，〈天津水西莊遺址保管委員會成立記〉，《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第 49 期，1933 年 9 月 25 日，第 4 版。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 報紙、期刊

《大公報》(天津)
《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北京)
《申報》(上海)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天津)
《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天津)
《河北博物院畫刊》(天津)
《直隸實業雜誌》(天津)
《教育週報》(杭州)
《監察院公報》(南京)
《藝林月刊》(北京)

(二) 書籍

天津博物院籌備處，《天津博物院陳列品說明書》，天津：天津博物院籌備處，1917。
金梁，《光宣小記》，1933，鉛印本，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典藏。
屠坤華，《萬國博覽會遊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周學熙著，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張謇，《張謇全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張謇，《癸卯東遊日記》，收入《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第2冊，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537-560。
嚴修，《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嚴修，《嚴修日記》，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嚴智怡，《巴拿馬賽會直隸觀會叢編》，天津：實業廳，1921。

- Burton, St. John. *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 Tientsin: The China Times Ltd., 1908.
- Neuhaus, Eugen. *The Galleries of the Exposition*. San Francisco: P. Elder and Company, 1915.
- Official Catalogue of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with awards)*. San Francisco: The Wahlgreen Company, 1915.
-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Guide to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Tientsin: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1900.
- Toothaker, Charles R. *Commercial Raw Materials: Their Origin, Preparation and Uses*. Boston and New York: Ginn & Company Press, 1905.

(三) 報刊文章

- 允，〈參觀北疆博物院〉，《廣智館星期報》，242(天津，1933)，頁 5-8。
- 施昕更，〈華北二博物院參觀印象記〉，《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第 3 期(杭州，1935)，頁 65-68。
- 孫欲光等，〈視察河北博物院報告〉，《市師》，1：2(天津：1937)，頁 130-138。
-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二十三年度本館參觀人數統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第 3 期(杭州，1935)，頁 58。
-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二十二年度館務紀要〉，《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第 2 期(杭州，1935)，頁 130-139。
-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概況〉，《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第 1 期(杭州，1933)，頁 1-21。
- 張宗芳，〈河北博物院沿革紀略〉，《河北月刊》，4：4(天津，1936)，頁 1-3。
- 陳善耆等，〈視察北疆博物院報告〉，《市師》，1：2(天津，1937)，頁 173-192。
- 雲南省立博物館，〈雲南省立博物館二十年一月份所售各種參觀票銀數人數統計表〉，《雲南教育周刊》，1：7(昆明，1931)，頁 23-4。
- 雲南省立博物館，〈雲南省立博物館二十年二月份所售各種參觀票銀數人數統計表〉，《雲南教育周刊》，1：8(昆明，1931)，頁 16-17。
- 劉炎臣，〈記河北博物院〉，《大公報》(天津版)，1935 年 5 月 5 日，第 16 版。
- 廣西省立博物館，〈廣西省立博物館近況及過去工作〉，《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1：4(北京，1936)，頁 38-43。

二、近人論著

- 于海漪，《重訪張謇走過的日本城市》，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3。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籌備經過報告〉，《民國檔案》，2008：2(北京，2008)，頁 27-33。
-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421-475。
- 王翁如，〈實業家嚴智怡〉，《天津文史資料選輯》，1995：3(天津，1995)，頁 117-120。
- 付燕鴻，〈近代城市貧民階層的形成與時代特徵——以近代天津為中心的考察〉，《城市史研究》，28(天津，2012)，頁 71-84。
- 江沛，〈留日學生、東游官紳與直隸省的近代化進程(1900-1928)〉，《史學月刊》，2005：5(開封，2005)，頁 56-66。
- 何延喆，〈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天津繪畫〉，《北方美術》，2002：2(天津，2002)，頁 30-33。
- 林伯欣，〈「國寶」之旅——災難記憶、帝國想像，與故宮博物院〉，《中外文學》，30：9(臺北，2002)，頁 227-264。
- 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5(北京，2005)，頁 14-39。
- 徐永治，〈論 20 世紀初直隸地區的社會整合——兼評袁世凱與北洋新政〉，《清史研究》，2000：3(北京，2003)，頁 1-12。
- 徐永治，〈論 20 世紀初直隸地區的社會整合——兼評袁世凱與北洋新政〉，《清史研究》，2000：3(北京，2000)，頁 1-12。
- 徐堅，《暗流——1949 年前安陽以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 徐蘇斌，《近代中國建築學的誕生》，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0。
- 徐蘇斌、青木信夫，〈創造近代公共空間——清末新政時期天津河北新開區勸業會場建設〉，《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天津市社會科學第四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集》，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頁 388-395。
- 涂小元，〈天津近代博物館概覽〉，《天津文史資料選輯》，2005：1(天津，2005)，頁 202-221。
- 涂培元，〈天津新學書院的形形色色〉，收入黨德信總主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 第 24 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頁 477-488。
- 郝慶元，〈直隸工藝總局資料選編〉，《天津歷史資料》，第 16 輯(天津，1982)，頁 1-78。
- 張利民，〈近代華北城市人口發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1(北京，1998)，頁 189-203。
- 張利軍，《甲骨文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張紹祖，〈天津新學書院簡史〉，收入《天津和平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天津，1989)頁 49-58。
- 陳志雲，〈畫尼文信《山水冊》考釋——兼談蔡守談月色伉儷與諸家的交誼〉，《廣州文博》，2014：8(廣州，2014)，頁 117-130。
- 陳為，〈新文化運動與博物館的關係——兼述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初步發展〉，《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5(北京，2011)，頁 47-58。
- 陸惠元，〈陸辛農先生年譜〉，《天津文史叢刊》，1989：10(天津，1989)，頁 166-188。
- 陸惠元，〈天津考工廠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中國博物館》，1987：1(北京，1987)，頁 82-85。
- 陸惠元，〈天津博物館事業的拓荒人——華石斧〉，《天津文史叢刊》，1989：11(天津，1989)，頁 101-109。
- 陸惠元，〈草木有緣潛心人——記陸文郁先生〉，《植物雜誌》，2000：3(北京，2000)，頁 36-38。
- 遼寧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遼寧省志統計志》，北京：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 戴麗娟，〈在「邊緣」建立「中心」——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輔仁歷史學報》，2009：24(臺北，2009)，頁 229-256。
- 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2(臺北，2013)，頁 329-385。
- 謬仲泉，《天津城市規劃》，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 譚旦岡，《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臺北：臺灣書店，1960。
- Conn, Steven.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Chicago: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2000.
-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Bennett, Tony. "Civic Laboratories: Museums, Cultural Objecthoo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 *Cultural Studies*, 19:5 (2005): 521-547.

- Claypool, Lisa. "Zhang Jian and China's First Muse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3 (2005): 567-604.
- Christ, Carol Ann.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8:3 (Winter 2000): 675-709.
- Fernsebner, Susan R. "Material Moderniti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 1876-195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2.
- Fong, Grace.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2004): 1-58.
- Hamlish, Tamara. "Gobal Culture, Modern Heritage: Re-membering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In *Museums and Memory*, edited by S. A. Crane, 137-1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reps, Christina. "Curatorship as Social Practice."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46:3 (2003): 311-323.
- Markwyn, Abigail. "Economic Partner and Exotic Other: China and Japan at San Francisco's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9:3 (2008): 439-465.
- Preziosi, Donald. "Narrativity and the Museological Myths of Nationality." *Museum History Journal* 2:1 (2009): 37-50.
- Shao, Qin. "Space, Time, and Politic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antong." *Modern China* 23:1 (1997): 99-129.

Connecting to the World: Yen Zhiyi and the Birth of the Tianjin Museum

Hui-chun Yu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Yan Zhiyi's curatorship during the "museum movement" in the newly developed Beiyang downtown area (北洋新區)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ianjin. Under the national campaigns of "revitalizing China through industry" (實業救國) and "guarding our national culture" (文化救國), Yan Zhiyi (嚴智怡, 1882-1935), the Chair of the Industrial Commerce Section of Industry Department of Zhili Province (直隸省實業廳工商科), had directed Zhili Commercial Museum since 1912. He then founded and had curated Tianjin Museum since 1918, as well 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ianjin Museum of Fine Arts in 1930. In 1915, Yan led a team to San Francisco for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fter this major event, Yan and his team traveled to several major cities in the U.S. They visited museums, had conversations with curators, and brought many museum materials and new ideas back to Tianjin. Then, Yan and his colleagues organized a new museum, the Tianjin Museum, based on what they had learned in the U.S. In 1923, the Tianjin Museum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All its objects were collected or donated from all over the province.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objective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an curated not only objects exhibited in museums, but also the social connections as well as cultural productions related to these museums.

Keywords: Yan Zhiyi,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Tianjin Museum